

# 全球對話

12.2

##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 與Shruti Majumdar 談社會學

Sebastián Galleguillos

### 反思烏克蘭 戰爭

Sari Hanafi

### 關於資本主義 的理論

William I. Robinson  
Patricia Ventrìci  
Esteban Torres  
Fabrìcio Maciel

### 高等教育的 挑戰

Johanna Grubner  
Stephanie Ross  
Larry Savage  
Ka Ho Mok  
Elizabeth Balbachevsky  
Yusef Waghid

### 理論觀點

Michael Burawoy

### 土耳其的 社會學

N. Beril Özer Tekin  
Aslı Telsereñ  
Dicle Koylan  
Özkan Öztürk  
Ilknur Hacisoftaöglu

### 議題開講

- > 從超全球化到永續合作
-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Völklinger Hütte
- > Karl Polanyi 談右翼「民粹主義」
- > 從殺人犯的故事中學習
- > 巴西數位平台的貨運工作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2卷 / 第2期 / 2022.0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 主編的話

**本**期的「社會學對話」中，我們訪談了 Shruti Majumdar。她是一位來自印度的社會學家，目前任職於聯合國終結對婦女暴力信託基金計畫，專精性別暴力議題。在本次訪談中，她和訪談人 Sebastián Galleguillos 分享自己工作的經驗，討論社會學之眼如何在跨國組織事務上發揮作用。此外，她也為那些對於在國際發展領域結合學術與實踐有興趣的社會學家，提供了一些建議。

烏克蘭戰爭爆發至今已超過半年，在此期間，我們見證了許多國際關係與政治局勢的巨大變動。本期刊物邀請到國際社會學學會會長 Sari Hanafi 撰文，回頭檢視過去五年間的情勢，帶領我們一同反思於世界各地爆發的戰火如何造成破壞性的影響，並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俄羅斯侵略戰爭帶來的重大斷裂。

第一個專題深入探討資本主義理論，呈現出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取徑與觀點。Patricia Ventrici 對科技變遷、不穩定化與工會化之間的連結提出了具體的分析；Esteban Torres 則將「全球化」概念引入資本主義理論，以解釋日益複雜的全球階級結構。Fabrício Maciel 以巴西社會為對象，說明在理解專制主義與右翼運動時，除了不穩定外，也應將貶低尊嚴與階級的因素納入討論。最後，William I. Robinson 從全球視角呈現中心與邊陲的地理階層變遷，以及此變遷下各國內部加劇的不平等。

1990年代初期至今，新自由主義對公共領域的重構，使高等教育機構越發市場化。在 Johanna Grubner 促成的第二個專題中，我們將討論在此背景下，正於各地發生的變遷。Stephanie Ross 與 Larry Savage 分

析當今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如何受新自由主義化影響，產生工作制度的商品化與重構。Ka Ho Mok 則分析東亞高等教育機構規模化、勞動市場高度競爭下，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就業機會。Elizabeth Balbachevsky 討論了大學在面對新民粹主義政府時面臨的挑戰，並說明在巴西，半自治的決策過程如何確保了大學的穩定。Yusef Waghid 批判性地審視隨疫情而成為趨勢的遠距教學，並主張依據非洲的 ubuntu 精神，重新建構南非大學的運作形式——大學應該具有自主性，並與社會相互連結、定位。

「理論對話」則針對資本主義提出反思。Michael Burawoy 借鑑於 Erik Olin Wright 的真實烏托邦概念，系統性地與馬克思及波蘭尼的思想對話。他向我們呈現同時使用這三種理論取徑的優勢，同時揭示三者的共同追求：「將人類從資本主義手中拯救的集體行動者將由誰組成？這是馬克思、波蘭尼與 Wright 留給我們回答的問題。」

本期地區專題「土耳其的社會學」由 N. Beril Özer Tekin 主導，其中文章涉及多個主題，包含性別不平等、疫情下白領階級勞動者與其工作／生活習慣、疫情對高齡者的影響、當今土耳其政府的環境政策取向等議題。

「議題開講」中，Hans-Jürgen Urban 的文章，以及被贈與本刊的攝影集，深入闡述了工業的發展；Bruna de Penha 和 Ana Beatriz Bueno 則針對數位平台中的外送勞動提出見解。此外，本節也收錄另外兩篇文章，分別以波蘭尼的理論視角分析右翼民粹主義、對犯下謀殺罪行者提出社會學反思。■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主編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 [GD 網站](#)。

>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mailto: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 編輯團隊

主編: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 Raphael Deindl, 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編: 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國編輯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亞)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Mumita Tanjeela, Bijoy Krishna Banik, Sabina Sharmin, Abdur Rashid, M. Omar Faruque, Mohammed Jahirul Islam, Sarker Sohel Rana, Md. Shahidul Islam, A.B.M. Najmus Sakib, Eashrat Jahan Eyemoo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Shamsul Arefin, Yasmin Sultana, Syka Parvin, Ruma Parvin,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Sharmin Akter Shapla, Md. Shahin Aktar.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l.

印度: Rashmi Jain, Rakesh Rana, Manish Yadav.

印尼: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蘭: Urszula Jarecka, Joanna Bednarek, Marta Błaszczczyńska, Anna Turner, Aleksandra Biernacka.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Irina Elena Ion, Bianca Mihăilă, Ruxandra Păduraru, Ana-Maria Rențea, Maria Vlasceanu.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廖宇雯, 黃翊碩, 簡芊楹, 賴奕璋, 林韻柔, 周芸瑄.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本專題匯集了當前關於階級、數位化、社會不平等、以及資本主義理論為這些議題帶來的見解。



本專題中的文章，分析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並探討現今高等教育體系的轉型過程及後果。



本期國家專題裡的文章，分別針對土耳其社會學中不同領域的議題進行討論，包含性別、科技和環境社會學等引人入勝的主題。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 社會學對話

社會學如何抵抗對女性的暴力  
專訪 Shruti Majumdar  
Sebastián Galleguillos, 美國 5

## > 反思烏克蘭戰爭

烏克蘭、普丁的帝國典範與歐美  
Sari Hanafi, 黎巴嫩 8

## > 關於資本主義的理論

資本主義與全球不平等  
William I. Robinson, 美國 10  
拉丁美洲的平台資本主義  
Patricia Ventrici, 阿根廷 12  
資本間體系：分子與有機階級  
Esteban Torres, 阿根廷 14  
不體面資本主義  
Fabrício Maciel, 德國 16

## > 高等教育的挑戰

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義化、市場化與不穩定化  
Johanna Grubner, 奧地利 18  
後疫情時代下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義化  
Stephanie Ross 和 Larry Savage, 加拿大 19  
高等教育與就業：東亞趨勢  
Ka Ho Mok, 香港 21  
在巴西民粹主義下的大學韌性  
Elizabeth Balbachevsky, 巴西 24  
一所烏邦圖大學的可能性  
Yusef Waghid, 南非 26

## > 理論觀點

真實烏托邦的必要性  
Michael Burawoy, 美國 28

## > 土耳其的社會學

土耳其社會學：挑戰與可能性  
N. Beril Özer Tekin, 土耳其 31  
土耳其的性別平等／不平等與女性主義  
Aslı Telseren, 土耳其 32  
土耳其的疫情與中產階級消費  
Dicle Koçyan, 土耳其 34  
土耳其的環境主義社會學  
Özkan Öztürk, 土耳其 36  
捲入土耳其意識形態衝突的女性  
İlknur Hacısötaoğlu, 土耳其 38  
土耳其的疫情和「數位移民」  
N. Beril Özer Tekin, 土耳其 40

## > 議題開講

超全球化到永續合作的路徑選擇  
Hans-Jürgen Urban, 德國 42  
大自然的反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文化遺產弗克林根鋼鐵廠  
Max Aulenbacher, 德國 44  
為什麼要向上看？Karl Polanyi 談右翼「民粹主義」  
Sang Hun Lim, 南韓 47  
從殺人犯的故事中學習  
Martín Hernán Di Marco, 挪威 49  
巴西數位平台的貨運工作  
Bruna da Penha 和 Ana Beatriz Bueno, 巴西 51

「我給新手社會學家的建議，是廣泛地吸收跨學科、跨領域的理論與實踐知識。並且，不要害怕問大問題。」

Shruti Majumdar

# > 社會學如何抵抗 對女性的暴力

## 專訪 Shruti Majumdar



**Shruti Majumdar** 目前任職於聯合國阿富汗女性辦公室，是終結女性受暴基金的計畫執行人。她曾在世界銀行與聯合國工作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於印度、孟加拉、塞爾維亞、約旦與烏茲別克等國從事女性賦權相關計畫的規劃與研究。Shruti 擁有布朗大學的社會學碩士、博士，以及德里大學 Lady Shri Ram 學院的社會學碩士學位。

本次的與談人是 **Sebastián Galleguillos**，目前於約翰杰刑事學院就讀博士班，並已經取得國際犯罪與正義的碩士學位。他同時是國際社會學協會聯合國青年代表、智利塔爾卡大學刑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學術興趣包含比較犯罪、社交媒體與犯罪、監禁的替代方案等。

SG: 可以和我們聊聊你現在在聯合國的工作嗎？你做這個工作多久、主要的職責是什麼？

SM: 我從2018年開始就在[聯合國婦女署](#)底下的終結女性受暴基金計畫中工作。我們支持並投資各地的民間社會組織，試圖終結對女性的暴力。聯合國信託基金創辦至今已經25年，在與女性權利相關組織及女性運動合作上有著深厚的歷史。光是在2020年間，我們支持了150個由民間發起的計畫，橫跨71個國家／地區，其致力於多個面向的議題，包括：服務暴力倖存者，強化防止侵害女性權益的法律、政策與行動計畫，以及透過消弭暴力與性別不平等的根源來預防暴力的發生。

作為監測與評估專家，我的工作內容主要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我負責直接與民間團體聯絡，協助他們建立研究與評估能力、以數位科技作為計畫核心。我幫助他們找到最為合適、安全、道德的方法，來掌握其計畫對於社群的影響力。第二且最主要的工作，是試圖在聯合國婦女署中，建立研究對於女性受暴議題的功能與影響力。這部分的工作相當重要，因為對女性與女孩的暴力極為普遍——[在全世界，三個女性當中便有一個曾通報自己曾遭受來自伴侶／非伴侶的肢體或性暴力](#)，而這個數字於過去十年間並未改變。我們知道暴力是可以被預防的，因此從這些組織前線數十年的工作經驗中學習，是極為關鍵的。我也會參與研究計畫的撰寫、資源動員、管理外部

&gt;&gt;

研究團隊，並與這些身在前線的組織進行知識生產；參與上述研究，也反饋到我對於這些組織的日常照顧中。總而言之，我必須持續地在社會學研究與發展實踐中來回穿梭，這是我一直很熱衷的事情。

SG:你曾經花了許多時間學習社會學，並在不同大學中取得了大學、碩士、博士的社會學學位；你如何將這些社會學的思考與技能，應用在聯合國婦女署的工作上？

SM:的確，我花了將近十年時間，於正規教育體制中學習社會學，就連現在也還在精進自我。我是在2000年代初期取得德里大學社會學的學士學位。如同許多年輕的印度社會學者，M.N. Srinivas 的著作與他對社會學的信念，對我有很深的啟發。他深信這個學科本身、其方法與工具，能夠協助人們理解這個世界——特別是社會的結構與變遷。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對社會學研究有興趣、想要以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待現實世界的問題。因此，在大學畢業後，我很快就搬到了美國，開始攻讀布朗大學的社會學碩士、博士學位。布朗大學帶给了我許多養份，協助我以發展社會學、跨學科工作應對世界現今的發展議題。在那裡，我對結構暴力和社會運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開始好奇為何某些族群在特定時間、空間更容易被邊緣化(或受到動員)。當時我修習了量化方法的課程，同時也深受優秀的民族誌吸引。在就讀博士、於世界銀行擔任社會學家的期間，我很幸運地有機會在印度、孟加拉、塞爾維亞、烏茲別克、約旦、賴比瑞亞等國家的大型發展項目中，進行民族誌研究。

如果要問我如何將社會學技能應用在聯合國的實務工作上……老實說，我每一天都在使用它們。社會學視角對於女性受暴議題而言，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例如：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在於那些促使暴力發生的社會結構與規範；和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創造相關計畫；評估這些計畫是否、如何能夠如預期地發揮效用。你可以在[這邊](#)找到我最近的成果，這是和來自全球、超過一百位的社會科學學者合作產出的一系列文章，以三個語言發表；文章的主題是關於如何預防女性受暴，分析哪一種方案有最佳的效果。這是這類研究領域中，首次有人嘗試結合量化與質化方法，來解析那些特別困難的問題，包括：交織的脆弱性；相較於其他女性，特定女性為何較容易

受暴；如何動員社群以預防暴力；民間組織平時遭遇了怎樣的困境或反彈，又如何發展出應對策略。總體而言，這個研究領域仍然屬於公共衛生經濟學者，其較常關注的是「什麼」才能有效的終結暴力。以社會學研究分析其「如何」、「為何」有效，並探討污名、權力、結構暴力等問題之後，我們得知，應該要做的，是更致力於發展長期、整體且可持續運作的相關方案。

SG:根據你的經驗，社會學家在國際組織中工作時，可能會面臨哪些挑戰？你如何克服這些挑戰？

SM:在我看來，機會是多於挑戰的！不管是發展計畫的分析、設計或是評估，社會學家可以提供很多幫助，也有許多藉由跨學科合作並產出豐碩成果的途徑。我目前能想到的幾個挑戰(有些是所有研究人員都面臨的，有些可能是社會學家面臨的)，是要超越學科與學科間，以及發展的研究與實踐間的界限。我們如何將社會學理論有效地用於實踐？如何利用實踐為理論提供資訊、又如何如何在兩者之間創造更多的對話空間？

雖然兩者皆身在議題的最前線，且需要互相合作，研究與實踐卻經常有著不同的節奏。對於順利產出符合倖存者、受暴者或即將受暴者需求的方案來說，找到有效對話的方式是極為重要的。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員參與快速導入研究，其能夠以理論為基礎，分析民間組織及政府平時處理的問題類型。說到這個，我很幸運地成為了世界銀行[社會觀察站](#)的成員，目前正於南亞進行革命性的嵌入式研究。尤為重要的，是要學習並記錄民間組織的日常實踐，並藉此為社會學理論提供更多資訊，特別是女性權利組織——他們身在前線數十年，卻總是難以找到辦法記錄自身的工作經驗。

第二個挑戰是專屬於社會學家的，即如何以嚴謹的民族誌研究為基礎，重新思考發展實踐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幾年前，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精彩且發人深省的文章[〈如果社會學家的影響力和經濟學家一樣大怎麼辦？〉](#)。如 Michèle Lamont 於文中所述，針對特定計畫提出的問題，往往是經濟學家有能力回答的問題。如果有更多社會學家參與計畫的生產過程，被提出的問題將逐漸轉向如何與為何，例如：由民間組織或政府領導的計畫，如何、為何影響巨觀的社會系統及結構。

&gt;&gt;

SG: 在聯合國婦女署期間, 你推動了哪些政策, 來強化女性在疫情期間的權益? 在你看來, 有什麼面向是我們沒有注意到的?

SM: 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封城, 導致幾種形式的暴力事件明顯增加, 尤其是親密伴侶暴力(因為更多女性被和施暴者困在一起)、非伴侶的性暴力、網路性騷擾, 以及某些地區的傳統習俗, 例如女性割禮或是早婚、強迫童婚。在聯合國信托基金工作的這段時間, 我和許多民間組織合作, 定期撰寫關於這些趨勢的文章, 藉此引起決策者和捐助者的注意。隨著解封期限一再地延宕, 各地的民間組織都將這樣的處境視為長期的危機, 開始為此準備臨時的應對措施、嘗試加強復原能力。那些規模較小、更基層的組織, 需要有能夠彈性運用的中心資金, 才能有足夠的力量運行下去, 處理薪水、醫療保險、通訊、交通等支出。封城嚴重削弱了民間組織的能力, 並威脅其生存。他們的空間被用於病毒的相關測試、庇護所與工作人員皆不堪重負, 有些組織甚至關閉辦公室、縮小規模, 在最需要人手的時候, 不得不選擇裁員。這些組織的運作有其必要性: 疫情期間, 女性仍需要向當地的女性權益組織與社區機構求助, 不管是透過WhatsApp、社群媒體、熱線、人際網絡, 還是直接聯絡庇護所、自助團體的領導人、社區衛生工作者與輔導員、宗教領袖、律師助理。

為解決此問題, 聯合國婦女署藉由籌備更多資源、向民間團體提供彈性資金等手段, 來擴大對民間社會的支持。同時, 我們持續傾聽, 並向他們學習<sup>1</sup>。在目前的處境下, 這些組織作為第一線接收到通報的人, 能夠提供我們大量有效的即時資料, 而我們必須使政策制定者與研究者注意到這些資料, 並一同合作以合理地運用他們。簡而言之, 倖存者的聲音與草根民間組織必須是政策的起點, 終結對女性的暴力, 也應該要藉著這個機會扎根於在地。

SG: 最後, 你對那些剛在國際領域開始職業生涯的新手社會學家, 或是社會科學家, 有什麼建議? 或你受否有任何相關工作機會的建議或資訊?

SM: 我的建議是多閱讀, 涉獵不同學科中關於理

論與實踐的知識。不要擔心自己提出的問題太過龐大! 藉由理論知識與方法論工具, 社會學家絕對有能力以深思熟慮且具批判性的方式參與於發展實踐的推動。疫情的經驗, 使我們認知到性別平等進程的脆弱性, 以及其面臨的挑戰有多龐大。如今是個關鍵的時刻, 人們逐漸意識到, 我們必須針對各個領域的權力結構, 做出深入、長遠的改革。我們要產出更多考量整體的方案, 將根深蒂固的父權體制與性別不平等, 視為需要克服的挑戰。此外, 我們需要反思: 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與制度, 創造、體現並使父權體制系統得以存續? 如何在特定的環境與時代, 對其作出可存續的改造? 我相信社會學家在研究與實踐中, 都能為此貢獻。

我也鼓勵剛開始職業生涯的年輕社會學者, 儘量多累積一些實務經驗; 參與聯合國的國家級計畫, 可以有效地使你對複雜的發展議題, 有更多基礎的理解。類似的工作機會可以在[聯合國職業網站](#)上找到。除了對實務領域的近況有基礎的理解, 隨時跟進相關領域的最新研究也相當重要。這對於想要同時在學術與實踐上有所掌握的人來說甚是重要。談到這裡, 我也得強調ISA這類組織的重要性——身在其中能夠使你有更多向同儕學習的機會, 隨時跟進學術發展、推廣自己的研究, 甚至建立合作關係。

最後, 我想要串連那些身兼學術與實踐工作的社會學家, 向他們尋求幫助時, 請不要猶豫。我發現和母校的校友保持聯絡, 在理解工作性質上有很大的幫助。直到現在, 他們都仍然於我的支持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 協助我在這個複雜且持續變動的領域中, 找到前行的方向。■

來信寄至:

Shruti Majumdar

<[shruti.majumdar@gmail.com](mailto:shruti.majumdar@gmail.com)>

1. [聯合國婦女署\(2020\)由下而上的聲音: 疫情對於女性受暴議題的衝擊。](#)

# > 烏克蘭、普丁 的帝國典範與歐美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國際社會學學會會長(2018-2023)



來源: Pixabay / 創用CC。

近  
日以來，俄羅斯進犯烏克蘭的事件震驚世界，其不僅是一場獨立戰爭，更具有許多特殊性——這場戰爭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成為一場核武戰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向東侵略的舉動深具挑釁意味——或至少如巴勒斯坦哲學家 Azmi Bishara 所言——是下定了決心要開戰(2022)。然而，這並不代表侵略行為與踐踏其他國家的主權是具有正當性的。國際社會學協會在戰爭剛爆發時及發表聲明<sup>1</sup>，針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進攻表示關注。不管是對國際社會學協會還是對我來說，戰爭永遠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其違反了我們一貫擁護的價值與信念。國際社會學協會將與烏克蘭的社會科學家，以及全球各地的學者站在同一陣線。我們也支持身在俄羅斯、白俄羅斯等地的同儕，他們為抵抗這場戰爭而發聲，致力於保衛民主與人權<sup>2</sup>。

## > 普丁的帝國典範

普丁領導之下的俄羅斯，持續地對人類長久發展的自由民主理想造成破壞。自2000年掌握政權之後，普丁積極地對那些試圖民主化的國家(喬治亞、敘利亞、烏克蘭等)發動戰爭。此外，普丁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模仿了美國的權力展示行為(如入侵伊拉克)，但兩者還是有差異——海珊領導的伊拉克確實是個獨裁政權；而烏克蘭內部即便針對加入北約有歧異，但其仍然是個民主國家。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烏克蘭有超過半數人贊成加入歐盟，贊成加入北約的人則不到一半(Bishara 2022)。這種矛盾的立場其實是明智的，因為他們考量到俄羅斯抱持著糟糕的「強權民族主義」(great power nationalism)。大國民族主義以三個要素為基礎：由東正教會與沙皇形塑的俄羅斯認同；將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視為一體的斯拉夫民族性；以及與前亞洲蘇聯共和國

和中國結盟為「歐亞大陸」的概念，其有助於建立俄羅斯的雄偉形象。19世紀的沙皇俄國，曾被馬克思稱為歐洲的反動堡壘；普丁手中民粹主義式的俄羅斯也試圖扮演這個弱勢的角色<sup>3</sup>，即便此時的俄國早已不再是經濟上的弱勢。不久之前，我才親身經歷了俄羅斯與伊朗於敘利亞的戰爭，並見證了俄羅斯的真面目——這是一場超越民族國家與身份主義，由「雄偉地域」所發起的，權力投射的實踐；其基礎是一套反映了普丁以自身為中心、帝國典範的世界觀。Carl Schmitt 曾為普丁典範進行分類(Lewis 2020)，俄羅斯哲學家 Aleksandr Dugin 協助普及。

## > 四項反思

作為一位社會學家，以及一個生活在中東的人，我將在這篇文章中和讀者分享四個自己從這項戰爭中得出的反思。

第一，是歐美的國際關係論述與實踐之間有著雙重標準。在談論全球南方時，反抗、抵制、團結的鬥士等詞彙是禁止使用的，不過在描述烏克蘭戰爭時，同樣的詞彙卻帶有正面的意思。正如伊斯蘭社會學主席 Lev Grinberg 所述<sup>4</sup>「以色列軍事佔領巴勒斯坦領土五十五年，明明是違反國際法，怎麼可能沒有任何西方國家對其發起制裁？」許多學者公開支持在機構與個人層面全面地抵制俄羅斯學者；然而當巴勒斯坦對西方國家發起抵制、撤資、制裁等運動時，人們卻將其視為犯罪行為。

第二，是相較於烏克蘭戰爭，在其他地區發生的殘酷戰火，怎麼就沒有引起歐美國家同等的注意呢？作為一個在敘利亞長大的巴勒斯坦人，有許多不同方式可以描述我至今的生活。其中一種，是我在一個只有短暫和平的地區經歷了多次戰爭，例如：1967年、1973年的以阿戰爭；2000至2005年在巴勒斯坦領土發生的以色列戰爭——二次革命；2008、2012、2014、2021年的以色列對加薩地區的戰爭；1982、2006年在黎巴嫩的以色列戰爭；1980至88年的兩伊戰爭；1991年的科威特；1991、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至今的敘利亞戰爭；2014年至今的葉門戰爭；2014至2020年的利比亞戰爭。這些猛烈的戰火造

>>

成的大規模破壞、痛苦、流離失所與死亡，遠遠高於烏克蘭戰爭。面對這些戰火，西方大國卻一直沒有太大的反應，經常以穩定、經濟等名義支持殖民國家(以色列)或獨裁者(海灣和埃及)。

第三，某些將焦點放在過去的帝國主義，或是現今歐美新殖民主義的後殖民評論文章，似乎都忽略了有其他正崛起的帝國，更沒有注意到他們在征服其他地區時有多麼殘暴。俄羅斯、伊拉克、以色列、土耳其以及波斯灣地區的國家，皆是對中東有極大影響力的帝國，其中幾個國家的軍事行動更促成了殖民主義、悲劇與獨裁主義的形塑。Laura Doyle 提出的「帝國交互性」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現象。她認為帝國具有連續性，且往往在平行的運作下，產出了「當代帝國歷史中共構、極度非預期、互動性的政治，以及其未曾預料的、有時甚為諷刺的效應。」(Doyle, 2014) 因此，在這些如植物根系一般，有著層層交疊的脈絡與動態的帝國之間，發生的事情並非只是單純的連鎖效應，事件往往互相影響，且是座落於特定的制度處境之下，背後有著策略性的追求。

第四，呼籲要支持全面抵制俄羅斯或巴勒斯坦的學術，是違反學界所追求的價值的。我相信面對任何有殖民或獨裁色彩的機構，我們肩負著發起制度性抵制的道德義務，但我並不支持在個人層次發動抵制。讓相關機構中的個人參與在討論中，對於理解面對衝突的不同觀點，以及保持開放、積極的對話與溝通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這意謂著，光是支持那些具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是不夠的——身在學術界，我們必須仔細地傾聽那些在各種程度上拒絕擁抱這類理念的人，並扮演好中介的角色，實踐兼具情感、道德與政治性的策略。我反對激進的批判性社會理論，並認為應該要將處境納入考量；在批判權力的同時，必須能與我們批判的對象展開對話。很明顯地，學術論述的開展應該遵循某些與知識完整性及社會責任有關的規範。這樣的責任可以預防宣傳、煽動、妖魔化他人文化與仇恨言論發生；也正是這樣的責任，使得學術自由的意涵，不只是其宣稱的「人人有表達自由」這麼簡單。學術的功能，是將政治從 Schmitt 所描述的那種朋友／敵人概念中解放。(此概念中，最高程度的連結是願意與群體的其他成員一同戰鬥、死亡；最高程度的分離則是願意殺死敵對群體成員。)我完全同意歷史學者 Amit Varshizky——如果要使政治自由主義生存下去，便要認真對待敵對批評者的想法，而非輕蔑地否定。德國哲學家 Ernst Cassirer 也在二戰後指出：「為了打擊敵人，你必須了解對方。這是一套完善策略的首要原則之一。了解敵人指的不只是理解其缺陷，更要理解其強大之處。我們都可能低估敵人的強大……，應該深入研究政治神話的起源、結構、方法與技藝。我們應該與對手面對面，以找到打擊對方的方式」<sup>5</sup>

## > 結論：強化團結

我想在最後提醒大家，在決定面對社會受苦時，我們應該將人道的道德推論，與 Mauss 在禮物一書中描述的那種人與生俱來對社群的關愛互相結合，以促進血親、鄰居、國家甚至人類整體的團結。並且，我們應該以全體人類最高等級的團結為目標，如 Jan-Christoph Heilinger (2019) 的「世界性義務」那般。我們必須承認，歐洲對於烏克蘭戰爭的反應，呈現出其團結並不是世界性的，而是由文化、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關係、民族主義認同作為動力。我提出這些反思，是為了化解那些出現在學術界、大眾媒體上的評論；其批判我們相較於烏克蘭，在面對敘利亞、阿富汗、非洲難民時有極大差異。我們必須注意到，藉由不同道德推理，將能預防任何試圖將複雜問題簡化的情況；例如將不同的待遇歸因於純粹的種族主義<sup>6</sup>。西方學者應做好心理準備——是時候接受阿拉伯與穆斯林在文化、宗教上與西方之間的親密性，而不再將其視為危險的教派主義關係。■

來信寄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mailto:sh41@aub.edu.lb)>

## 參考文獻

- Bishara, A (2022) "Russia, Ukraine and NATO: Reflections on the Determination to Not Avoid the Road to War." The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 Doyle, L (2014) "Inter-Imperiality: Dialectics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History." *Interventions* 16 (2): 159–96.
- Heilinger, J-C (2019) *Cosmopolitan Responsibility: Global Injustice, Relational Equality, and Individual*. Berlin ; Boston: de Gruyter.
- Lewis, DG (2020) *Russia's New Authoritarianism: Putin and the Politics of Order*. First e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https://www.isa-sociology.org/en/about-isa/isa-human-rights-committee/isa-statement-on-the-russian-military-offensive-happening-in-ukraine>.
  - 國際社會學協會也在網站上增列了所有機構的[反戰聲明](#)，包含國家社會學協會、研究委員會以及其他學術協會，以及烏克蘭社會學協會)清單
  - <https://litci.org/en/once-again-bastion-of-reaction/>
  - <https://www.972mag.com/ukraine-lebanon-russia-israel/?fbclid=IwAR0Qq6eemWkOmPJPfjzlPOl5VAeOmCpHmYQUKew7RwXHO1vDjZ6LDxttss>.
  - <https://www.haaretz.com/world-news/premium.HIGH-LIGHT.MAGAZINE-to-understand-putin-you-first-need-to-get-inside-aleksandr-dugin-s-head-1.10682008>.
  - 當然，這種批評有些是有道理的。可以參考 H.A. Hellyer 的文章〈Coverage of Ukraine has exposed long-standing racist biases in Western media〉<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2/28/ukraine-coverage-media-racist-biases/>.

# > 資本主義與全球不平等

William I. Robin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美國



迦納的都市街景中，貧窮無處不在。  
來源：Jenna/Flickr，創用CC。

**國**際發展機構樂施會 (Oxfam) 指出，2018 年全球前 1% 富有的人們獲得了全世界 52% 的財富；全球前 20% 富有的人們，佔有了全世界 95% 的財富；而其餘 80% 的人們，只有 5% 的財富來維持生活。這樣不平等的狀況在樂施會發布調查報告時，已是如此地駭人聽聞，而近幾年，這種現象更是持續地惡化。在 2021 年，樂施會做了後續的追蹤調查，結果顯示在新冠疫情流行的頭六個月，全球富豪的財產有 10 億美元的驚人劇增，且在疫情期間，每個國家財富不平等的情況皆嚴重加劇。

## > 資本主義的擴張與不平等的發展

與資本主義體制的擁護者意見相左，研究不平等的激進社會學者觀察到這種社會兩極化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現象。因為資產階級擁有生產財富的方法，他們盡可能地將社會集體生產的財富作為利潤佔為己有。此外，資本主義在這 500 多年間不斷地向外擴張，透過不斷積極地尋找新機會，達成資本積累（使利潤最大化）作為它得以一直存在的方式。資本主義從西歐的中心地帶擴張出去，透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近期的全球化

>>

浪潮，最終吞噬了整個地球。至21世紀初，已沒有任何國家或是人民被排除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外。

社會學者指出，全球資本主義體制造成緊密交織的兩種不平等形式，一種發生在富人與窮人間，如同樂施會的調查指出是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另一種則是將全球人們分為富人與窮人或是國家間不平等的階層化。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剛果的人均年收為 \$785 美元，然而在19世紀末殖民剛果的比利時，人民的人均年收入為 \$47,400 美元。在學術詞典中，全球的極化源於殖民主義將世界分為以西歐、北美、日本為核心的「第一世界」富裕國家，而像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等遭受殖民且被的核心國家支配的區域，則被邊緣化歸為「第三世界」。近年來，學者和專家將早期的第三世界指稱為全球南方，第一世界則稱為全球北方。

根據 Karl Marx 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以及布爾什維克革命領袖 V.I. Lenin 提出的帝國主義經典理論，還有與他同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激進政治經濟學者、國際關係學者在二戰後期間皆發展了新的關於依賴性、世界體系和低度開發的理論。他們說明，殖民主義組織世界經濟的方式是使邊陲地區生產的財富被虹吸回核心區域，造成前者變赤貧，而後者變得富裕，這樣的模式解釋了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不平等。因此，他們表示資本積累在空間上是不均勻的，且使得一些人們生活在已開發的環境，另一些人們則處在未開發的環境。

## > 全球不平等現象的變化模式

然而在世代交替之際，新的趨勢對於輕率地劃分國家與人民的情況產生了質疑。首先，一些前第三世界，特別是東亞地區的國家，在工業化後也加入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等富國俱樂部。第二，即使在最為貧困的國家中也湧現了強大的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重要的高消費力，他們都已被整合入全球消費文化中。第三，在傳統的富裕國家中，工人階級經歷了二戰後的繁榮期，但由於現今的全球化，他們面臨社會經濟的不穩定，也面臨迅速地向階層流動的問題，這些都逐步破壞了他們曾經安穩的生活。因此有些社會學者指稱這些工人階級面對了「第三世界化」的困境。

瑞士銀行UBS近期發佈了一項調查，指出世界上多數的億萬富翁都在美國，但整個亞洲的超級富豪人數正迅速地增長。以中國來說，它現在佔有全世界億萬富翁的五分之一那麼多，且每週都有兩個新的億萬富翁誕生。另外，巴西、墨西哥、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等，以及其他屬於跨國資本家階級的資本家們都在當今全球經濟市場中投資了數兆美元。此外，富比士的調查中顯示，比起其他區域，前第三世界中那些超級富豪的資產正以飛快的速度向上成長。如「在2012年至2017年期間，孟加拉的超級富豪俱樂部增長了17.3%」而除此之外，「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增長率為13.4%，而越南的增長率為12.7%；肯亞和印度則分別被記錄了11.7%和10.7%兩位數的增長。」

有些人根據這些趨勢提出論點：與其按照地理區域或是領土的方式說明，還不如使用跨國人口群體去指稱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更為合適。從此觀點來看，全球南方不只包括了前第三世界的貧困者，也象徵性地指向在富裕國家的窮人與被排斥者；而全球北方則指集中在傳統富裕國家中掌有不成比例權力與財富的富人們，以及全世界維持、管理和享受權力中心的強人們。即使社會學者持續地爭論著這些問題，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以任何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我們都需要將財富向下徹底地重新分配給世界上多數的貧窮的人。而無論我們意願為何，這都需要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當權者進行對抗，因為上述樂施會報告中提到的那百分之一的人類，也就是控制全球經濟的跨國公司精英將會抵制任何對於他們財富和權力的挑戰。■

來信寄至：

William I. Robinson

<[w.i.robinson1@gmail.com](mailto:w.i.robinson1@gmail.com)>

# > 拉丁美洲的平台 資本主義

Patricia Ventrici, 勞動研究中心(CEIL-CONICET),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阿根廷



一位烏拉圭的零工勞動者。外送服務是數位化與不穩定之關係的案例之一。

來源: Ted McGrath/Flickr, 創用CC。

**技**術公司令人眼花繚亂的成長，因疫情的爆發而呈現指數性成長，放大了平台資本主義在拉丁美洲的發展，並加深了圍繞在全球南方的資本、勞工以及其變異的一些辯論和現象。

## > 數位化的菁英制和「飛躍式發展」

該地區的一些國家，例如阿根廷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們已經看到，「知識經濟」提供了一個

歷史性的機會，以實現渴望已久的「飛躍式發展」，並且在國際框架下取得新的地位，這樣的公共論述正在逐漸被鞏固。該地區的某些國家，例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能夠發展全球尺度的數位公司（被稱為獨角獸，它們在美國股票市場的交易額可以超過一億美元）正是這種論述的基礎。

此外，這種質變將由一個新的企業精英領導，他們在加州精神中成長，與當地傳統的寡頭政治相對立，而後者則主要與農業有關，並在較

>>

小程度上與裙帶資本主義的一些基本領域有關。這批新的年輕領導人，顧名思義是受全球性的使命和精神的驅使，並以當代的主流語言為母語，將自己定位為與傳統的「民族資產階級」相對立，後者的特點是永遠依賴國家補貼的精英，缺乏競爭、省級的、保守的、過分僵化的，而且總是有點不合時宜。

這樣一來，夢想中的熊彼德經濟終於可以通過數位菁英制的魔法降臨在這些緯度上。數位經濟的生態，表現為對以租為本的舊有寡頭制的超越。初創企業和獨角獸是資本主義進步的新名詞，對我們這些邊陲國家來說是渴望的。

### > 雙面未來：數位化和不穩定性

然而，這種類型的企業在該地區急速但仍處於萌芽的發展狀態，顯示了一個支離破碎和對比鮮明的現實，即數位化和社會不穩定因素，作為平台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之間產生的連鎖效應。這種社會兩極化的運動除了在各種層面上，也在數位平台對於勞動世界所產生的重構上，非常明顯。目前，關於該地區「未來工作」的辯論被兩個明顯對立的形象所主導：一方面是與軟體產業相關新工作的複雜性，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應用程式獲得需求的平台工人（Uber、Glovo和Rappi的司機、家務服務等）的高度不穩定性。處於金字塔頂端的第一種人是高水平的，即使考慮到他們以美元為單位計算的工資，他們的工資是明顯便宜的，但他們所享有的工作條件在當地是優勢的，而這主要是由於從事這類工作的工人（軟體工程師、網頁設計師、資料科學家、系統分析員）是相對缺乏的。對於需要勞動力來擴大業務的在地公司來說，這種缺陷構成了主要問題。在光譜的另一端，微型工作的極端不穩定性意味著必須加強放鬆管制的模式和勞雇關係的極端靈活性。在一些國家，如阿根廷，意味著在勞動保障層面的偉大歷史成就的瓦解。在這個方向上，工作平台化的進展為勞動力市場中極高的非正式性結晶做了有力的準備，在那裡，這些新型的「獨立」工作是一種新事物。

### > 劃時代的演講：企業家精神

在象徵性操作的層面上，有一條指導性的線索將這些在物質上如此遙遠的層面聯繫起來，也就是創業語言。這很大程度上是對企業基礎的象徵性建構，已經變成某種官方意識形態，其中平臺公司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化身。它需要在一個超個人化的主體形象中證明其價值，在一個絕對不受社會條件限制的幻覺下，以自由、大膽、創新、自主、風險和超生產力的漫無邊際的想法為動力。該地區的大型技術公司在這種話語裝置中找到了一種工具，它能非常有效地構建一種有利的常識，這種常識強烈地滲透到社會結構最遙遠部門的世界觀中。在拉丁美洲目前深刻的危機背景之下，創業精神以其技術—自由—數位精神，實現了晚期的新自由主義。

因此，在最低限度社會支持的崩潰和企業不可預見的資本集中這些背景下，自由，基本上也就是市場自由，這個廣為流傳的概念，與對其不斷加劇的辯護之間產生了一個明顯的悖論。而在邊陲資本主義的「失敗」國家中，更是如此。創業語言的操作試圖將不穩定的日常經驗的痛苦轉化為風險的腎上腺素，並將困境轉化為所謂的個人機會。這種對「賦權」的賭博演變成了社會受苦的私有化和對主體的更高程度的責難，他們被貧窮的物質條件和尚未實現的超生產力所加倍地束縛著。

這種新的社會結構的發展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挑戰增加了新的複雜性，這意味著產生了新的常識和集體組織的視野。工會和社會運動，是抵抗的主角，是這一挑戰的主要行動者。但他們的潛力，正在經歷一個關鍵時刻，取決於他們解構不合時宜的邏輯的能力，以及重新塑造能與正在發生的困境相匹的集體形式。■

來信寄至：

Patricia Ventrici

<[patriciaventrici@gmail.com](mailto:patriciaventrici@gmail.com)>

# > 資本間體系：分子與有機階級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CONICET, 阿根廷

為了解釋社會變革進程的進展，有必要關注世界佔有遊戲 (world appropriation game) 的歷史演變，它同時發生在社會世界不同的國家、地區和全球領域<sup>1</sup>。我可以把WAG，或世界權力遊戲，定義為一個可變的互動領域，它是在六個歷史系統的交叉點上形成的：資本主義系統、國家系統、通訊系統、種族系統、父權系統和自然系統。資本主義體系構築了19世紀以來社會世界的核心物質層面。這使得它，用簡化的話說，成為了統治系統。

由於WAG的演變，資本主義體系所經歷的核心變革是它建構了一個新的世界階級結構。有關的社會階級與馬克思和韋伯典範概念化的，十八、十九世紀的第一批歐洲工業城市的商業集團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如果說馬克思的階級結構的核心是由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簡化對立關係來定義的，那麼今日社會世界中的階級結構則主要是在分子階級和有機階級之間的辯證基礎上去做定義。如果說前者的關鍵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那麼決定後者組成的首先是收入的來源。

## > 分子階級

分子階級可以被定義為個人的依賴和經濟配置模式，首先與他／她的收入結構有關。分子階級的主體是個人而不是群體。至少從二十世紀末開始，社會世界的每一個國家領域都被某一個分子階級結構所塑造。

在這種結構中，可以區分出四種類型的階級：利潤依賴型階級、勞動依賴型階級、救助依賴型階級和犯罪依賴型階級。在任何時候，界定一個人是否屬於某個分子階級的是他／她的主要

收入來源。如果主要收入來源發生變化，個人就會被「重新分類」。反過來，每個人不僅在某一時刻屬於某一分子階級，而且屬於該階級的某一層次。

一個人的階級層次是根據與收入的量相關的經濟地位來定義的。截至21世紀，在社會世界的國家範圍內，有可能確定存在著五個階級層次。由上而下，我稱它們為頂層、上層、中層、下層和底層階級。屬於頂層階級的人是超精英階級的一部分，是日益增長的、令人不齒的億萬富翁的世界。屬於高階層的人是下層精英的一部分。這一對頂級階層構成了精英領域。另一方面，屬於中層、下層和底層層次的個人則構成了大眾領域。後者是一個具有重要內在差異的領域。

因此，與現代階級理論所提出的不同，階級不是層狀結構的指標；每個階級都是分層的，每個層次都是不同階級上的層次。一個分子階級可以在一個以上的層次中實現，一個層次可以彙集一個以上的階級。

## > 有機階級

如果說分子階級關係源於每個國家領域內的，個人階級之間的結構和互動模式，那麼有機階級關係則是基於全球領域內的，國家和地區階級之間的結構和互動模式。一個有機階級相當於一個國家和/或地區的分分子階級結構。有機階級是一個國家系統的從屬和經濟配置的模式，主要是根據其收入結構來定義的。通過意識到有機階級的世界網路的存在，我們就有可能從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一般和單一的概念轉向資本間體系的概念。因此，從我的角度來看，我們通常所說的「資本主義體系」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體系，一個

>>

# 「我們常說的『資本主義系統』是個龐雜的體系，是一個不對稱互動的資本主義體系式的系統。」

不對稱互動的資本主義體系，在其組織形式上有內部差異，但在其抽象的最大化邏輯上沒有區別。

在資本間體系中，有三種典型的有機階級互動：(一)知識依賴階級(資訊資本主義)、(二)產業依賴階級(工業資本主義)、(三)商品依賴階級(商品資本主義)。反過來，也能夠辨識出現存的兩個相互決定的有機階級層次：核心和邊陲。一個次區域、一個國家或一個大陸，從屬於這兩個層次之一的事實取決於其經濟規模，反映了其全球經濟地位。

自19世紀資本間體系的世界化<sup>2</sup>以來，知識依賴和產業依賴兩個有機階級在核心層次中複製；而商品依賴階級則在邊陲層次中複製。因此，國家或地區的階級是根據其有機階級和其層次的雙重身分來界定的。需要強調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有機階級定義了分子階級這個世界的物質性核心。這意味著每一個個體，或者說所有的階級個體，都是從一個核心或邊陲系統中重新創造出來的。這樣的定位意味著有一個額外的物質性的決定來源，具有超越個人的特徵。因此，社會世界中每一個階級下的個人都是從一個雙重從屬和雙重配置、分子和有機的角度來配置的。

自1980年代以來，當代世界化的進程一直在擴大，這也與資本間體系的階級結構的日益世界化有關。隨著這種擴張，階級不平等不再僅僅是不同國家社會經濟結構中個人階級之間的不平等，而且在核心上，也代表了世界分工中國家和地區階級之間的不平等。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種新的取徑上，分子階級和有機階級不被認為是行為者。與現代社會階級理論不同，階級中不存在固有的行動邏輯。個人的階級和國家的階級都不是社會行動者，更不用說有預定的傾向了。至少自 Bourdieu 以來，這一社會事實已經變得很明顯。個人的階級在實際行動時成為個人行動者，而當他們創造或將自己納入公司、國家、工會、社會運動等時，他們成為集體行動者。如果不考慮這個世界階級結構，社會行動是無法解釋的<sup>3</sup>。■

來信寄至：

Esteban Torres

[esteban.torres@unc.edu.ar](mailto:esteban.torres@unc.edu.ar)

1. 在這裡，「全球」和「世俗」之間的區別具有核心意義。根據我的理解，全球是以擴張或收縮的方式從社會世界的每個國家地點那裡所形成的單一領域，而世俗則是從全球領域的集合中建立的。更確切地說，世界性是由國家、地區的和全球範圍的領域構成的(參見Torres E,〈World Paradigm. A Proposal for Sociology〉,《Global Dialogue 11.1》,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uploads/imgen/2238-v11i1-chinese-traditional.pdf>, pp. 40-41)
2. 社會世界的擴張，不同於全球化。
3. 這資本主義理論將在新書《The Intercapital System: The New Economy of World Society》(資本間系統：社會世界的新經濟，即將出版)。

# > 不體面資本主義

Fabrizio Maciel, 客座教授,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德國

**理**解資本主義並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因為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經濟體系，以及一種生活方式。整個二十世紀，人們曾經多次對資本主義的不同階段嘗試進行定義和分類。如今，在二十一世紀，這個系統的技术層面已經顯現出了最有侵略性的一面，在全球範圍內生產了一種新的數位底層階級。在這種情況下，新冠病毒下的疫情使世界各地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變得更加清晰和深刻。

為了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我們需要擺脫以政治小說化為基礎的、對現局的幻想。這已經成為全球主流媒體的主要專長，將政治領域轉化為一個偉大的奇觀，並系統性地隱藏了經濟領域正發生的事情。在此，我們需要重構將我們帶到現在這個時刻的，更加龐大的結構性與歷史事件。

## > 全球底層階級的崛起

自1970年代以來，世界就如 Karl Polanyi 的著名表述，資本主義已經歷了一場「鉅變」。歐美福利國家在經歷了輝煌的30多年後面臨垮台，是理解這個「勇敢新世界工作」的主要起點，正如 Ulrich Beck 挑釁地定義。

在福利國家的黃金時期，從二戰結束到1970年代中期，資本主義仍在努力向世界證明其促進社會正義的能力。隨著福利國家的失敗，以德國、法國和英國等核心國家的不穩定工作為指標，人們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將永遠不會是一個能促進任何正義的系統。

從那時起，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建設已經在全球範圍開始，我稱之為不體面的資本主義。它的主要招牌便是在邊陲和核心國家中都生產出了全球性的底層階級。底層階級的存在一直是邊陲國家，甚至整個大陸的印記，例如拉丁美洲和非洲。如今，隨著移民的大量到來，也由於核心國家和大陸大眾階級的內部貧困化——如美國與歐洲——全球底層階級的生產成為不體面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

在此情況下，這種新的資本主義就專精在生產並自然化人類生命價值的缺陷。例如，巴西憲法中尊嚴的概念提醒我們，個人需要維持其物質生存和道德存在的最低水平。當這種最低限度的需求沒有得到工作機會或國家政策的保障時，我們所擁有的就只是在定義全球底層社會生活的屈辱狀況中沉淪。在巴西，這種沒有任何工作的底層階級達到了經濟活動人口中的30%，正如 Jessé Souza 所定義的那樣，生活在次等公民的狀態中。另外有30%的人，是不體面的工人階級，在我們通常定義為不穩定的工作狀況中生存。

## > 不穩定或尊嚴？

不穩定和不穩定工作的概念值得我們反思——它們只是描述了明顯不好的情況和工作條件。我提出不體面工作的概念，正是因為它使我們能夠闡明當今世上數百萬人所經歷的物質性悲劇、屈辱性的道德及生存狀況。以巴西為例，30%的人口生活在尊嚴的邊緣，因為他們至少還有一些工作，即使是不體面的工作；另外30%的人則在尊嚴線以下，因為沒有任何工作。

>>

## 「大多數巴西領導階層在2018年的選舉中，仍然傾向保有基於極端菁英市場心態的威權主義情緒。」

在歐洲，特別是法國，Robert Castel 為理解不體面的資本主義提供了重要的觀點。對他來說，福利國家的衰落意味著薪資社會的斷裂。其主要特徵是社會解體的過程。在過程中，勞動市場驅逐了越來越多的人，而沒有為他們的加入創造新的條件。其結果是作者所說的「剩餘」的社會生產，也就是歐洲的底層階級，現在將成為全球底層階級的一部分。

### > 不體面的資本主義和極右翼

在這種脈絡下，我們需要研究不體面的資本主義與在全球政治舞臺上崛起的極右翼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打破普遍的理論，即是左派及其政黨的錯誤使得新威權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出現。再一次，我們需要破除對現狀的幻想，重建置我們於此的深層結構分析。

在德國的案例中，Klaus Dörre 顯示了工作不穩定性的增加以及堅定極右翼的心態與情緒之間的直接聯繫。有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威權主義是不體面資本主義的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原因，儘管它可以在偶然的情況下加深不體面，就像在巴西和當今世界的其他幾個國家。

因此，當大眾階級因為害怕被迫陷入不體面的狀態而堅持威權主義情緒時，統治階級則因為害怕失去他們有社會保障的特權狀態而與威權主義調情。這就是我多年來對巴西領導階層所進行的實證研究所顯示的。憑藉特權階級的出身、高薪和奢華的生活方式，大多數巴西領導階層在2018年的選舉中堅持了基於極端菁英市場心態的威權主義情緒，這在 Jair Bolsonaro 的論述中明確體現。

現在，隨著政府的極端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屈辱感加深，與它在疫情面前的死亡政策相聯繫，巴西人民正在發出一個強烈的訊息。Lula da Silva 在2018年因巴西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和法律欺詐而被捕，現在在2022年出現在總統投票意向的第一位。我們將看到，在不久的將來，這段不體面的歷史是否會出現一些逆轉，以及世界可以從中學到什麼。■

來信寄至：

Fabício Maciel

<[macielfabricio@gmail.com](mailto:macielfabricio@gmail.com)>

# > 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義化、市場化與不穩定化

Johanna Grubn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奧地利, 以及《Global Dialogue》助理編輯

**發** 軼於1980年代的根本性鉅變被視為新自由主義起啟動經濟、政治與社會重構的原動力,而高等教育部門及大學作為其整體重塑的公部門之一,自1990年代以降漸漸受到經濟化及新自由主義化的滲透,在許多國家都可以發現從國家官僚體制的監管轉向市場、經貿組織及調控機制的現象,後來也導致了不同程度上的後果。

這樣的轉變可能與下列三點相關:一,在許多國家中,在自由選修的前提下,標準化的學程與其規範是基於個人興趣而決定,也全然地改變了學生過往的學習模式。與此同時,大學經歷普及化後,對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機會有很大的影響,但學歷本身卻貶值了。二,在許多高等教育體系中,僱用制度已經完成了從福利國家到工作福利國家的新自由主義轉向,而因此導致其不穩定。藉著高效地提高生產力,針對大學及學術機構的市場化排名,這樣的競逐創造並增加了一類的工人主體,似乎也與彈性、放任的勞動市場和工作場所的安排相互縮結。三,畢竟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這些新的要求對高等教育中的性別安排產生了影響,表現為性別中立。從結構上看,人們會更青睞那些有著良好時間掌控能力,而不需擔負照顧責任的人。

本專題中的文章揀選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轉變及趨勢,並聚焦在這些趨勢導致的不同結果。在最初的貢獻上,Stephanie Ross 和 Larry Savage 考察了新自由主義在加拿大高等教育部門對高等教育商品化以及工作制度重組所產生的持續性影響,其觀察大學針對疫情所做出的應對措施、機遇與顯而易見的改變必要性。Ka Ho Mok 則關注東亞高等教育機構的]普及化對畢業生工作機會的影響,他探究這



| Arbu 繪製。

種發展所帶來的高度競爭勞動力市場及其後果。Elizabeth Balbachevsky, 她的研究論及大學所面對的新民粹政府挑戰在於政府試圖擊垮了高等教育體系而非轉型。她展示了巴西的大學中,半自治的決策過程可以確保大學的穩定,尤其是遇上政府失靈導致行政部門垮台。鑑於遠距教學的批判, Yusef Waghid 挑戰了,疫情下,大學成為只負責知識轉移的機構。並提到(南)非洲大學在非裔民族的烏班圖(ubuntu)倫理下,使得大學的自治機構同時能達到團結,也立基於社群之中。■

# > 後疫情時代下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義化

Stephanie Ross, McMaster University, 加拿大; ISA 勞工運動 (RC44) 研究委員會成員。以及 Larry Savage, Brock University, 加拿大



2022年2月，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阿卡迪亞大學的教師協會舉行罷工。  
來源：Can Mutlu

大多高等教育工作者都能注意到現今的三大趨勢。第一，教學內容趨於市場化；第二，高等教育的工作內容、組織、人員分發和工作報酬都呈現戲劇性的改變；第三，在上述兩個相關的要素影響下，將持續推動高等教育中形成組織和鬥爭的浪潮。而這是種不平衡的阻力，且與應對、同意或退出等個人策略交織在一起。新冠肺炎的疫情使上述的狀況變得更加嚴峻，並從中產生了疑問：後疫情時代下的高等教育現況為何？而誰是其中的得勢者？

## > 新自由主義作為高等教育下的產物

在過去30年，高等教育逐漸呈現新自由主義化，使教學內容也隨之市場化。為了在全球化的競爭中生存，高等教育必須服膺於研究和勞動市場的需求。高等教育機構也屈服於市場法則，爭奪學生、學費、隨著學生而來的政府補助，和那些用財力影響學校方針的私人捐助者所提供的投資或慈善項目。多數「高等教育公司化」的研究者指出，內部決策規範和流程開始發生轉變。公司

>>

式結構將權力集中在高級行政部門，取代了以教職員和其他部門為主的學院治理。這種市場導向還控制了預算，並透過績效指標來構建內部和外部資源競爭。這些轉變在教育項目中也很明顯，現在必須吸引學生去考取在勞動力市場中有價值的證書，還必須向他們證明這些證書跟他們工作相關；而不是去發展他們的批判技能和觀點。

### > 勞動改革：新自由主義勞動體制的實踐

工作重組是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需要新的學術勞動過程和權力關係來實現這項以市場為導向的教育願景。具體而言，高等教育的勞動力過程受到工作流程的碎片化影響，將學術勞動力區分成教學、研究和一般服務等不同單位。同時，這也降低了對部分的人員的技能要求，並使他們替代性高的勞力越來越廉價。在高等教育中，以定期合約聘雇的教授和研究者越來越多。在這類短期聘約的教職員鮮少參與學院治理的情況下，這種方式不只可以節省預算，更能夠鞏固上層在行政上的控制。在工作勞動的強化伴隨著碎片化的現象下，求職者對稀少的「好工作」以及短期聘約的競爭也同時加劇。這樣的高強度工作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情緒勞動。學生們對教育的想像也受到大學新自由主義化下的影響，這也讓校方必須想辦法達到這些期待。最後，我們看到了在教師產能成為主要評量指標後，發展出的上層問責制和底層監視制度；個人履歷成了學術上的計時器，以用來約束自己往新自由主義的勞動方向邁進。

### > 後疫情時代高等教育：原封不動或除舊佈新？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加強了這三個趨勢：商品化和集權化、勞動改革與工作強度上升、抗爭和衝突。疫情爆發的急迫性讓學校上層能夠進一步的集中決策，並在規避學院本身情況下做出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針對是否恢復實體教學以及何時公布確切的返校時間，還有後續工作上的健康保護措施等問題是最快引起衝突的部分。此外，教職員對上層決策重返工作崗位上的動機存有擔憂。換而言之，上層的決定是優先考量市佔率和預算，而非教職員的安全。這些缺乏正面影響的決策導致眾人的不信任、憤怒、怨恨和底下的配合意願。

疫情也導致工作強度顯著地上升。教師們必須快速適應緊急的線上教學和相關操作，並學習新的科技。除此之外，許多學生線上學習的同時還要面對確診、死亡、失業和對未來的迷茫等。這時教師也被賦予期望，展現大量的情緒勞動陪伴同學度過困境。教師必須在壓抑自己恐懼的同時承擔學生們的感受。有些教師在家中工作的情況是，同時還要照顧到在家中也是在進行遠距上課的孩子。這些工作是建立在研究產出的要求並未減少的狀況下，這使得在原先已經高度分層的結構上就已佔有優勢的特權教職員更居上風。

新冠肺炎帶來的勞累加上教師對行政上的不滿情緒，以及為了恢復財務而採取的緊縮措施，正導致一種集體抵抗。雖然在疫情初期高等教育的罷工率急劇下降，但我們可以現在看到校園內頻繁的各式鬥爭和勞動力中斷的現象有所增加。最顯著的便是，2022年初期席捲加拿大和英國的高等教育教職員罷工；雖然嚴峻的疫情讓結社變得困難，但這些高等教育工作者仍在與學校高層疏離的情況下創造出空間，支持彼此。

罷工是否能改變後疫情時代下主張新自由主義的高等教育仍是個未知數。但我們知道的是，外界政策和經濟壓力會持續影響學校高層做出改革及決策，而這將激起學術界工作者的憤怒，甚至使抗爭行為變得激進。■

來信寄至：

Stephanie Ross <[rosss10@mcmaster.ca](mailto:rosss10@mcmaster.ca)>

Larry Savage <[lsavage@brocku.ca](mailto:lsavage@brocku.ca)>

# > 高等教育與就業： 東亞趨勢<sup>1</sup>

Ka Ho Mok, Lingnan University, 香港



高等教育的不斷擴張導致畢業生的就業壓力，並形塑勞動市場的競爭焦點。  
來源：嶺南大學。

**近**幾年，因高等教育大眾化下的畢業生開始求職，東亞面臨大量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勞工市場。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無疑造成這些社會新鮮人的壓力，因此提高了市場競爭力。表一顯示了東亞地區2020年不同教育程度的失業率（已篩選國家、地區）。雖然因失業率相對較低的關係，無法直接看出高等教育大眾化與失業率提升之間的關係，但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近期的畢業生因教育大眾化的關係，無法順利取得搶手的職位。這引起了關於入職工作品質的問題，包含他們是否在正規的勞工市場。

## > 高等教育大眾化與畢業生就業之挑戰

因為全球化的擴張以及知識經濟領域的改革，許多新興國家為了增加國際上的競爭力而推廣高等教育；預料之外的是，這些畢業生們仍

舊無法在勞動市場上展現出自身的競爭力。雖然全球失業率逐漸下降，仍有超過一兆七千萬人處於待業狀態（國際勞工組織，2019）。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自二十一世紀以來，青年的就業人口便呈下降的趨勢。相較於歐洲、北美和非洲地區，亞洲國家尤其東亞地區的青年就業率下跌狀況最為顯著（圖一）。東亞的數據顯示，在新冠疫情的爆發下，青年的失業率更是呈波動的上升趨勢。

近期的研究不斷表示，東亞和西方的新一代高等教育畢業生會面臨更大的求職困境，被迫面對職缺不足和失業的可能。圖二為東亞青年失業人口的趨勢。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可能為了取得工作而從事學歷要求較低的職位，造成市場上「大材小用」的問題。這些現象可能導致高失業率、低薪和低工作保障等狀況。高學歷勞工供過於求的現象不只揭露了人力資本理論中「傾

>>

2020年東亞地區的失業率  
按教育程度分類 (部分國家/地區)

國家/地區	教育程度	失業率 (%)
香港	中學後教育	5.10
日本	大專及大學	2.90
韓國	大學及以上	3.50
台灣	大學及研究生院	4.92

表1. 來源: 香港,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100062020AN20B0100.pdf>; 日本, <https://news.yahoo.co.jp/byline/fuwarai/20210325-00228342/>; 韓國統計資訊局, <https://kosis.kr/eng/search/searchList.do>; 中華民國(台灣)統計資訊網普查統計, <https://eng.stat.gov.tw/ct.asp?xItem=42761&ctNode=1609&mp=5>。

青年就業與人口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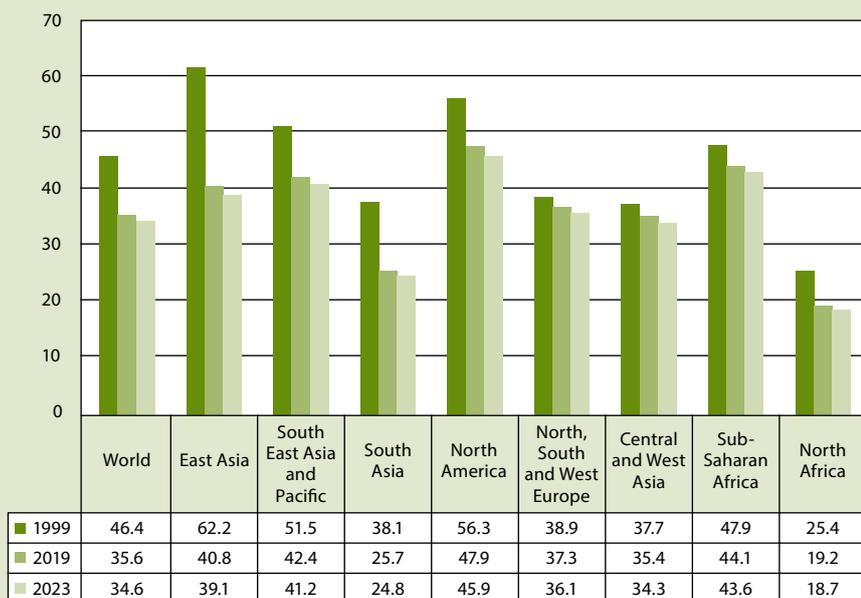


圖1. 來源: 世界銀行, <http://datacatalog.worldbank.org>。

東亞青年失業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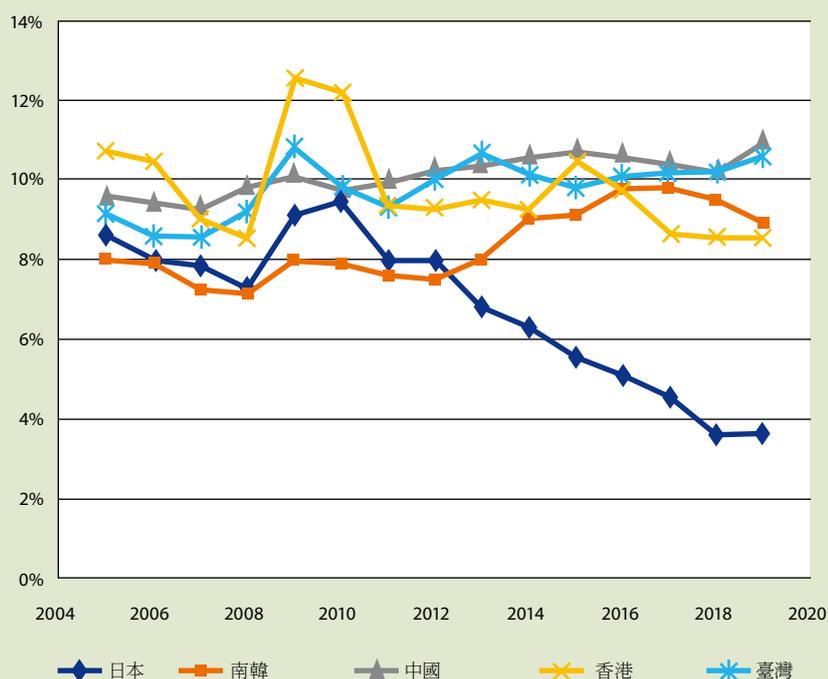


圖2. 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 <http://www.stats.gov.cn>; 香港政府統計處, <http://www.censtatd.gov.hk/sc>; 中華民國(台灣)統計資訊網, <http://www.stat.gov.tw>; 韓國國家統計局, <http://kostat.go.kr>; 日本統計局, <http://www.stat.go.jp>。

注資源在教育上能增加社會流動」的錯誤，更把新一代高等教育程度勞工無法取得相對應職位的現實擺在大家眼前；年輕勞工針對工作不穩定的不滿日益漸增。

以日本、南韓、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為例，大學學歷勞工的失業率在2004年到2020年間起伏不定（見圖二）。失業率沒有穩定下降的現象，表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無法解決東亞地區年輕人口的就業問題，代表這些社會新鮮人即使取得較好的學歷也無法幫助他們順利求職。日本在降低年輕人口失業率的方面表現得比較好，雖然2018年後有些回彈；因此，高學歷如何幫助取得一個較體面的工作是東亞國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 > 政策影響

本文闡述了高等教育大眾化如何帶給畢業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大學所學專業與市場需求不符的狀況。現今的研究發現了高等教育階段的知識習得與勞工市場需求接軌的重要性，但目前教育內容和市場要求技能呈現斷裂的狀況，有些供應方甚至認為學生們在市場領域的技能培育應該由校方處理。然而完善且優良的職場訓練並不與學生們未來的表現直接相關，因此高等教育機構應該謹慎的審視其課綱，協助學生面對未來瞬息萬變的社經脈動。

青年失業與低度就業的現象愈趨嚴峻，再加上人力資本理論不符現實的狀況，讓年輕世代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大，研究也顯示近幾年東亞的年輕人時常形容自己是不快樂的；在英國及歐洲等地年輕人外顯的負面情緒也迫使政府正視「新世代危機」。全球各地的政府都應該用嚴謹的態度面對這代社會新鮮人之間加劇的衝突，尤其是當已經有越來越多不悅的年輕人視教育、工作、居住與福利等世代不平等為這些問題的源頭時。■

來信寄至：

Ka Ho Mok

<[kahomok@ln.edu.hk](mailto:kahomok@ln.edu.hk)>

1. 該論文是作者近期論文的修訂和改編版本。Mok, KH, Ke, GG and Tian, Z (2022) 「Massification and privat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graduate employment from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s」，見 Brown, P 等人編輯之 *International Handbook for Graduate Employment*。Cheltenham: Edward Elgar 出版。

# > 在巴西民粹主義下的大學韌性

Elizabeth Balbachevsky,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巴西



黏貼於牆上的「民粹主義」字樣。  
來源：[flickr](#)。

**本**文著重於公立大學如何面對民粹主義政府的挑戰，並藉由探究巴西公立大學面對 Bolsonaro 政府的當代經驗來實現這一目標。

過去數十年來，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地面臨了許多治理方面的挑戰。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管理化和其他各種不同面向的挑戰形塑了高等教育、政府及社會之間的關係。然而，本文更必須進一步的指出新民粹主義政府的經驗：在這類的政府底下，大學不僅僅面對要求改革的敵對政策環境，更須面對政府比起政策轉型，更試圖擊潰大學等這樣具有敵意的環境。

民粹主義在政治分析上已經是個老術語，說明領袖如何藉著操控來自眾多人民的支持晉身或戀棧權力核心，其藉由精密設計的不同話語來編排社會上的各種不滿與委屈情緒以實現動員。目前，在知識份子所忽視的群體中普遍存在的的天不滿情緒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為政治企業家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透過投入時間和資源來表達並組織這種不滿的情緒。利用舊有的民粹主義

工具：培育領袖與支持者間的個人紐帶，和承諾會涵蓋與保護這些「長期被忽視的人民」。

## > 新民粹主義者對大學的攻擊

在這種話語中，大學和其他實體，代表著敵人：其被視為後唯物主義文化和價值的搖籃，挑戰了「人民」作為核心的信念。大學更體現了科學與科技，並威脅舊有的傳統。原有這種保持懷疑態度來建立事實的方法，卻是另一個質疑的來源，這些臆測使得大學成為另一個要被打倒的敵人。在新民粹主義更加集權的版本中，控制大學生活的政策具有更深的意義：它們的目的是要把大學變成傳播新民粹主義政權所支持的，主導意識形態的工具。

新民粹主義威脅著今日的巴西民主，然其根基於全球化所帶來的貧窮與不安全感，更進一步來說：其加劇了品質不穩定的教育以及普遍缺乏現代技術和能力培訓所帶來的不安全感。2018年贏得大選的總統候選人 Jair Messias Bolsonaro 更助長了這樣的忿恨，其操控不同的

>>

社群平台及製造多樣的敘事以針對他的支持者，每一種論述皆利用仇恨、憤怒，並將候選人視為所有不滿的正義表態，以及維繫舊有傳統價值觀的鬥士。

只要在總統辦公室，Bolsonaro 就可以藉由社群媒體動員起龐大、發散和多樣化的追隨者網絡的支持，以及大量來自不同黨派國會議員的熱情後援。在保守的政策底下，動員對Bolsonaro 的政治支持，其主要目的是拆除所有領域的限制框架：如環境、健康、教育、基礎設施和福利等。

Bolsonaro 政府亦視公立大學為敵。在不同的場合中，政府成員曾描述公立大學為為共產主義者和無神論者的巢穴，並指責大學當局容忍在校園內種植大麻。因此，政府針對聯邦大學預算嚴厲地進行刪減。法務部亦動用了1960年代的威權時期舊法，每在當學者和大學高級行政人員膽敢在公開談話中批評政府時，就對他們發起法律訴訟。政府還以疫情為藉口，凍結了新學者和雇員的招聘。另外，政府有兩個在不同場合干預大學自主的行為：縮編支持社會和人文學科的資源，並採取行動干預以性別和種族不平等為重點的研究所課程延續。最後，在許多方面上，政府試圖擾亂大學自治，繞過法規並指派小型保守運動的領袖為大學高層。

## > 來自大學的抵抗

儘管面對這樣的困境，巴西大學仍舊存活了下來。能親眼目睹疫情所帶來的挑戰，並能獲取資源創新教學、學習新的教學工具應用於遠距教學之中，與發表應用程式使經濟弱勢的學生得以使用網路。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和教學部門，透過理解疫情所造成的各種後果持續改善自身，矯正了當今巴西社會對於大學的觀感。

大學的抵抗來自幾個未竟的志業，首先特別是在媒體和司法上作為巴西社會的堅實後盾，其來自公立大學為1970和1980年代國家民主化奮鬥以來所扮演的重要位置。其次是同儕評量在科學與研究所教育政策中的角色，當面臨脅迫時，來自各個領域的學者們將團結起來支持學術自由。最後，合議制仍然是在巴西進行大學自治的根基，合議制意味著大學的決策是分散的，決策過程與許多享有半自治的決策中心重疊。院、系、實驗室、研究所、計畫都在內部決策過程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當政府的不當領導導致行政中心垮台時，這些中心則透過建立臨時聯繫，引領大學走出困境。因此，巴西經驗顯示，為了面對由新民粹主義威權政府帶來的風暴，舊有的治理模式仍存存續於大學的抵抗之中。■

來信寄至：

Elizabeth Balbachevsky

<[balbasky@usp.br](mailto:balbasky@usp.br)>

# > 一所烏邦圖大學的可能性

Yusef Waghid ·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 南非

本文將透過強調人性尊嚴與相互依賴性的非洲烏邦圖(ubuntu)的倫理概念，重新檢視大學的內涵。全球的大學已經發展成關注知識生產(再生產)的機構，目的上從個體自治、社會責任到為經濟與市場的利益服務上皆有涉略。然而，我最擔憂的是大學並沒有完全負起對社會該有的責任。

## > 危機下的社區大學

儘管宣稱南非的公立大學有進行過全面改革，但仍以消極的態度，不願意解決諸如學生抗議學費不斷提高的問題、學院內的貪污腐敗及資源的不當管理、性別不平等與排擠、性騷擾、成績賄賂、抄襲和紀律渙散、學生過量飲酒及偏差行為增加等問題。然而，最令人擔心的仍是大學的高等教育本身，目前的教學內容過度著重在既有知識的傳遞，而批判性教學的內容卻相當有限。疫情爆發後，隨即出現的遠距教學似乎使批判性教育又再次為了線上教學及混合學習法犧牲，好似這些針對高等教育教學手段能增加眾人對大學教育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學校所背負的公共責任似乎就受到了威脅，以搖搖欲墜形容大學機構現在的狀況也並非危言聳聽。

為了回應目前南非國內大學眾所皆知的嚴峻狀況，我認為校方應該重新思考非洲的烏邦圖智慧。在我的觀點中，無論是哲學或政治道德方面，烏邦圖皆可以回應目前的大學狀況。第一，烏邦圖面對目前大學面臨的困境，可以提供不一樣的思考模式；第二，重新訂定一個具教育和改革性的學校方針，融入群體的概念，培育學生掌握個體自由、團體活動和歸屬感之間的關係；烏邦圖的框架可以引發高等教育機構重新思考自身的改革潛力。

烏邦圖的獨到之處在於其與個人行為的內在連結，和與他人、環境以及電腦或其他科技產

品等非人之存在的外在關係展現。如俗諺「我在因我們同在」(I am because we are)強調，烏邦圖意旨自我與他者之間深層和互相的關係；受到烏邦圖啟發的行為著重在與他人共事，而非總是為他人做事；我認為帶有烏邦圖理念的大學可以主動做出帶有社會責任的行為。基本上，這樣的學校不只能夠推動改革計畫，更能擴大自身對社會議題的關注，這裡我指的是那些涉及理性和知識主張，和過去未被探究過的路線上的轉變問題。其次，這種學校會注意教育機構本身和外界社群之間的互動，並非將參與廣泛社群的行為視為服務的提供或發揮影響力的場域，而是符合機構和更廣泛公眾的利益進行合作。最後，學校宣稱將培養對當地和全球問題的道德關懷，能夠提升人性尊嚴、社會現狀，強化修復式正義和創造一個共享的和平世界。

## > 去殖民化與烏邦圖型態大學

對於社區大學而言，高等教育改革中最棘手且更應該積極看待的面向是，去殖民化的概念。當談論高等教育的去殖民化時，通常是指一種抵抗的實踐，這種實踐目的在於解開對高等教育實踐權力共享的誤解。在經歷去殖民化後，文化價值、經濟遠景和受殖民社群先前的知識興趣都有望在去殖民化的概念下重建。這也意味著，公立大學內的去殖民化能抵抗帝國主義的遺毒，和找回過去被貶低且邊緣的文化智慧。如此一來，去殖民化的高等教育更可以為過去受排斥社群的基本價值體系重新發聲，這便是去殖民化與烏邦圖連結所在。在某種意義上，烏邦圖連結也同樣認為他者的價值需要受到關注。因此，教育的去殖民化和透過烏邦圖概念進行的教育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時可能會被問到：烏邦圖型態的大學與創業型大學、思辨型大學和生態型大學有什麼差別？雖然上述類型的學校都強調認識論和自身

>>

# 「烏班圖的概念，可以促使高等教育機構重新考量自身的改革潛力。」

與周遭族群之間的道德關係，但我認為只有強調尊嚴和人性等情緒主義的烏邦圖概念大學能夠強化一所學校的自主性、責任感和思辨能力。

一個烏邦圖型態的大學有哪些關鍵要素呢？首先，「我在故我們在」中的「我在」凸顯出大學所提倡的自主性。擁護個體自主性是大學被創建的初衷與價值所在——正好呼應了格言中的「我在」。

第二，句中的「我們在」在烏邦圖的概念中與追求集體行動的概念有關，但烏邦圖所認可的集體性是建立在審議的行為之上，重點是必須透過參與者來提升審議式會議的素質；這樣的審議形式同時具有教育性和政治性。審議的實踐在高等教育中的成敗，取決於參與者是否能夠在大學內外主動提出批判。高等教育的意義在於，讓人們以開放、充滿反思性和連帶的精神一起工作和行動，共同探索事物的內在和外在價值。另一個重點是，烏邦圖型態的大學不能僅僅為了追求自我成長而進行高等教育，因為這樣就等於否認了大學對於公共、社會、全球的責任。

第三，烏邦圖型態的大學應該要有遠見，並且同時關注地方與全球的脈動。在這裡爭論我們對非洲大學的理解是有道理的，因為受 ubuntu 啟發的大學仍在成形當中。這樣的學校應當在關注地方和社會的學術研究之餘，還要去了解全球問題，探索共存的可能性並聽見多元化的聲音，並且與他人產生信賴關係以實現和平合作和進步。就是這樣一所烏邦圖大學，會用自己的方式是處理國際議題和反烏托邦問題。

最後，我們應該把烏邦圖的格言「我在故我們在」(I am therefore we are)改為「我在故我們在且能夠成為」(I am therefore we are and can become)。這意味著一所烏邦圖型態的大學應該永遠都在蛻變，面對可能性不輕易斷言，而是以開放的態度面對。■

來信寄至：

Yusef Waghid

<[yw@sun.ac.za](mailto:yw@sun.ac.za)>

# > 真實烏托邦的必要性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E**rik Olin Wright 為重建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先驅，他在馬克思基本階級間的仲介關係的研究，也就是階級位置的矛盾，已經轉變成全球性的計畫，並啟發橫跨全球的階級分析。其與階級的邏輯基礎與經驗關係持續搏鬥至其人生謝幕之時，於在其重量級著作《階級》(1985)、《階級很重要》(1997)和最後的反思《理解階級：二十一世紀階級論》(2015)中可見一斑。一般人總會自滿於完成一件重要的全球計畫，但自1990年代初，Wright 開始了第二輪全球計畫——即真實烏托邦計畫。這是貨真價實存在的蘇聯與其衛星國之社會主義垮台、中國過渡到國家資本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得到鞏固的年代。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底下，許多人聲稱馬克思主義已死。然而，Wright 反對這樣的觀點。他預見了復興馬克思主義的機會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從蘇聯與中國黨國體系的關係中解放出來，其抱持著遠大的社會主義理想——在資本主義的縫隙中成長的，或是從資本主義對於勞動依賴下生產的，建立在實際存在的制度中的願景。在他的專著《真實烏托邦》(2010)中為真實烏托邦構建一縝密的理論架構，和晚近呈現其理想宣言的《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2019)，在他死後翻譯成多達13種語言。

但Wright不僅僅是真實烏托邦的理論家，更是個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者，探訪世界各地追尋可能會挑戰資本主義的任何地方，並與試圖實踐自身承諾的社運人士展開對話。他不但啟發了學術界，更擴及為社會正義奮鬥的群眾。在和這些真實烏托邦的領導者們對話時，Wright 能找出它們的基本原則、內在矛盾以及其存續與傳播的條件。他自己不但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系所開課，也在世界的最遙遠的角落談論真實烏托邦的可能性與限制，而這些課程則在由 Verso 出版的系列書籍中結束。

在所有其促成的改變中，Erik Wright 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未竟之業，即把真實烏托邦們做為

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計畫團結起來。於《真實烏托邦》中，Wright列下了真實烏托邦試圖去消融的資本主義毀滅性特質，並宣稱其根源必來自公民社會之中。他更謀求重建社會主義社會，在《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中，他將真實烏托邦建立在其所擁護的價值觀中——平等、民主、社會正義和連帶——這些價值觀已被運用到資本主義的合法化，但在資本主義下只能部分實現。儘管如此，關於真實烏托邦背後的驅力以及它們在什麼意義上是反資本主義的，仍然存在模稜兩可的問題。在這篇簡短的文章中，我建議從 Karl Polanyi 的《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1944)中找到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答案。正如我將要論證的，Polanyi 的想法本身是有限的。他們需要被灌輸一劑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動態的理論。當我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 Wright 的概念從想像烏托邦轉向真實烏托邦時，這個循環就完成了。

## > 追尋真實烏托邦的團結

Wright的《真實烏托邦》架構非常簡潔：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診斷)、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解決方案)、轉換問題(治療)。Wright 對資本主義有 11 個批判，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延續了人類不必要的苦難、阻礙人類繁榮發展的條件、限制個人自由、違反平等主義原則、在關鍵方面效率低落、偏向消費主義、破壞環境、威脅到普遍持有的價值觀、助長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腐蝕社區、並限制民主。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控訴！這些因素彼此緊密相連，但它們沒有提供任何統一的主題或核心批判。

如果存在統一性，則不在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而在解決方案，即賦予公民社會相對於經濟和國家的權力，進而在社會主義中重建社會。他摒棄了困擾社會主義歷史的想像烏托邦的想法，著手發現「真實烏托邦」：實際上存在著具有反資本主義特徵的形式——機構、組織——它們在資本主義的夾縫中成長或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與之共生。

>>

# 「誰將形成集體行動者，把人類從資本主義中拯救出來？這是馬克思、波蘭尼和 Wright 留給我們的問題。」

他最喜歡的一些真實烏托邦是：基本收入補助金、合作社、維基百科、參與式預算、社會經濟。他的計畫是與實踐者合作，抽象地制定真實烏托邦，審視它的存在和傳播條件以及它的內在矛盾。真實烏托邦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們挑戰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或多個破壞性特徵。Wright 制定了一系列轉型策略——共生、裂隙、退出和破裂——但對這種轉型的推動者卻相當沉默。同樣重要的是，他未能將這些真實烏托邦與資本主義動態理論聯繫起來，這種理論可以解釋它們的出現以及它們對資本主義本身的挑戰。而我將透過 Karl Polanyi 和馬克思來拯救 Wright 的計畫。

## > 從 Wright 到 Polanyi

Polanyi 也迷戀真實烏托邦——Robert Owen 的公社主義、合作社的發展以及行會社會主義的雛形。他們都融入了 19 世紀的英國社會運動中，反對不受管制的勞動力商品化。正如我們所見，Wright 的真實烏托邦也可被視為對商品化的反動，但尚未確認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Polanyi 將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視為國家主導對不受管控的市場化之反應。然市場基本教義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周期性主張之間的邏輯關係是什麼？有趣的線索在著名的波蘭尼悖論——他沒預料到從 1970 年代開始的第三次市場化浪潮，即我們所說的新自由主義。我稱之為第三波市場化——因為 Polanyi 自己的歷史記載包含的不是一波而是兩波——一波在 19 世紀主要集中在對勞動力商品化的反應，另一波在 20 世紀由貨幣商品化（金融首都），前者導致社會運動的反應，後者導致國家的反應——有些是進步的，有些是病態的，而 Polanyi 特別警惕法西斯的反應。

Polanyi 認為人類再也不敢嘗試市場基本教義主義了，人永遠不再冒險破壞不受管控的市場，創造出他所謂的「虛構商品」——勞動力、貨幣和自然——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在不受監管的交易中被破壞。但他錯了。從 1970 年代開始，還有另一輪市場化，那為什麼他對這種可能性視

而不見？我相信，答案是他對市場基本教義主義有其理想在——一個危險的烏托邦，來自被誤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腦袋。

Polanyi 的理想主義還表現於其對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分析的敵意上——對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和由此產生的階級鬥爭的敵意。就 Polanyi 看來，馬克思高估了由剝削驅使階級鬥爭的可能性。的確，馬克思的敘述中存在一個悖論：當剝削不是顯而易見的而是神秘的，當工人對資本主義的最大擴張有物質利益時，怎麼會有階級鬥爭呢？

Polanyi 沒有與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悖論奮鬥，而是認為透過商品化的視角而不是通過生產的視角能夠更好地理解資本主義下的異化。對馬克思而言，商品化有助於使生產剝削神秘化，而對 Polanyi 而言，商品化的破壞性，尤其是「虛構商品」的破壞性，會造成剝奪和不滿。但是，拋開馬克思主義的動力，關注以剝削為代價的商品化，以犧牲生產為代價的市場，Polanyi 沒有資本主義動力理論，即（去）積累理論。因此，在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擴張中他看不到市場化的根源，而這就讓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

## > 從 Polanyi 回到馬克思

商品化不是由容易犯錯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創造的資本主義附帶特徵。相反，這是資本主義設法解決其生產過剩和利潤率系統性危機的方式。生產過剩被尋找新市場所抵消，這不僅發生在資本主義初期，而且貫穿整個資本主義，而且，有人可能會補充說，這涉及到大量的暴力。我們可以把帝國主義看作是對殖民地廉價勞動力的原材料提取，從而創造了新的消費市場。換句話說，正是透過市場化浪潮——商品化的擴張——資本主義克服了它所產生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反對商品化的運動可能是對資本主義的挑戰：反商品化可以是反資本主義的。因此，如果我們透過反復出現的商品化浪潮來體驗資本主義的破壞性，那麼商品化就可能成為反資本主義戰略的舞台。

馬克思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關於動態的資本主義理論，它確實使不斷深化的商品化成為資本主義生存所必需的條件。然而，馬克思只將對資本主義的抵抗視為來自生產鬥爭，他沒有將市場化本身、一切商品化視為集體抗爭的更強大來源。如果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資本主義下市場化浪潮必然性的唯物主義理論，那麼 Polanyi 則為我們提供了市場化所產生的，對資本主義的抵抗理論。

有了 Polanyi 和馬克思的基礎，我們現在可以回到 Wright 了。我們可以將他真實烏托邦視為反商品化計畫。基本收入補助挑戰勞動力的商品化，參與式預算和公共銀行挑戰資本的商品化，維基百科反對知識的商品化，農村合作社威脅土地和勞動力的商品化。因此，我認為反商品化是其另類真實烏托邦的一個統一框架。它們成為 Polanyi 所謂的反對運動的一部分。

### > 關於能動性的問題

馬克思拒絕用制度性內容充實共產主義，從而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從而允許任何政權或任何運動稱自己為「共產主義者」。Wright 對他的真實烏托邦提出了重要的校正，惟其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Polanyi 對商品化的批判提供了這種統一性，但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動態與連續不斷的市場化浪潮之間的關聯。即使馬克思低估了商品化的破壞性，他還是透過將積累與市場化串接起來為其提供了最後的黏著劑，但這種理論綜合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

首先，正如 Polanyi 指出的那樣，反商品化，即所謂的反對運動，最終可能會滋生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從而犧牲 Wright 烏托邦的民主特性。何者可以保證市場化的解決方案是民主的而不是專制的？

其次，Polanyi 認為，當商品化威脅到社會時，社會應當會做出反擊。我們不能再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換句話說，我們不僅要擔心反對運動的形式——專制的還是民主的——同時還要擔心反對運動是否可行。

第三，當反商品化成為「去商品化」的一種形式時，它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吸收策略。因此，建立福利國家可以引起對資本主義的苟同，而不是取代它。什麼情況下反商品化能變成反資本主義？

第四，市場化可能比商品化走得更遠，它可能把虛構的商品、生產要素從市場上完全驅逐出去，也就是廢物的產生，我稱之為「前商品化」。商品化會導致勞動力、土地、金錢、知識和環境的破壞。過去五十年的第三波市場化尤其如此。

第五，今天的挑戰是將反對運動擴大到全球層次，在沒有解決全球商品化框架的情況下，反對運動仍然存在於地方和國家層面。當我們處於第三波市場化之中時，我們居然仍熱衷於應對第二波市場化。

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引發了令人煩惱的施為問題：誰將組成集體行動者，將人類從資本主義中拯救出來？這是馬克思、Polanyi 和 Wright 留給我們解決的問題。■

來信寄至：

Michael Burawoy  
<[burawoy@berkeley.edu](mailto:burawoy@berkeley.edu)>

# > 土耳其社會學： 挑戰與可能性

N. Beril Özer Tekin, Doğu University, 土耳其, ESA 健康與醫學社會學研究網絡成員 (RN16)

土耳其的社會學非常活躍，有一些獨特的議題和討論領域。公民社會、政治、政策、環境問題、日常生活和消費是討論最多的議題。疫情影響的層面，除了土耳其與其他國家在獨特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動態和制度特徵上的差異之外，也影響了做社會學 (doing sociology) 的實踐。在各個社會階層所經歷的社會和經濟困難、疫情，以及從商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下，為目前正研究的課題帶來疫情的視角，也讓不平等的議題得到了更大的關注。

這一章節的文章，將幫助讀者更好理解土耳其的社會實在和社會學實踐。

Aslı Telseren 在「土耳其的性別平等／不平等與女性主義」中，討論了從過去到現在的女性主義運動。除了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她還指出了當前的挑戰，解釋疫情如何擴大性別差距，並增加性別暴力和殺害女性 (femicide) 的行為。這篇文章也指出，疫情顯示了女性勞動的重要性——包括有償和無償勞動。

Dicle Koylan 在「土耳其的新冠病毒與中產階級消費之情況」中，討論了疫情之下白領勞動者的新工作模式。文章主要關注於居家辦公為工作氛圍和習慣所帶來的改變。管理階層期盼更長的工作時間，卻無形地增加員工身上的壓力，同時改變其消費習慣。

在「土耳其的環境主義社會學」中，Özkan Öztürk 探討了土耳其這個國家對環境問題產生社會反應的歷史過程。他指出，目前作為土耳其主要政黨的正義與發展黨透過相關政策的設立，如水力發電廠等能源政策，進一步向大眾推廣環境議題。再加上網路的影響，環保主義論述能與更廣泛的受眾產生共鳴。

İlknur Hacısoftaoğlu 在「捲入土耳其意識形態衝突的女性」一文中，討論了性別不平等的情況，而她關注的是體育場域中的性別和身體建構。文章的最後強調，雖然女性的身體持續在政治辯論中被作為工具利用，但女性仍會為自己的命運抗爭。

在「土耳其的疫情和『數位移民』」中，N. Beril Özer Tekin 探討了疫情期間日趨嚴重的年齡歧視，並指出網路和智能數位技術能為老年人 (即所謂的「數位移民」) 帶來的可能性。她表示，土耳其可以通過網路減少排斥、社會孤立和不平等的現象，同時對此提出建言。

希望你能喜歡這個章節! ■

來信寄至：

N. Beril Özer Tekin

<[btekin@dogus.edu.tr](mailto:btekin@dogus.edu.tr)>

# > 土耳其的性別平等／ 不平等與女性主義

Aslı Telseren, Doğuş University, 土耳其, 以及社會與政治變革實驗室——巴黎西岱大學女性主義研究教學、文獻和研究中心(LCSP-CEDREF)



3月8日在土耳其的遊行。在疫情之下，將女性主義的訴求帶到街頭變得更加重要。

**性**別作為一種社會建構，指的是社會角色之間的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差異，會隨著時間和空間而變化。性別體制透過以社會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政治需求為依據的社會制度建構，決定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中的性別不平等和階級。因此，可以知道不平等既不是自然形成，也不是生物預設，而是由社會建構而成。

性別平等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指的是不分性別皆平等擁有取得公共、經濟、政治和社會資源的機會。社會學家 Nilay Çabuk Kaya 將性別平等定義為，男女平等參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sup>1</sup>。在這個脈絡下，性別平等將擴及到所有的個體，無論是順性別或跨性別的女性和男性；成人或兒童；就業或失業的人等。因此，性別平等不僅是政治生活中的平等代表，更與女性運動和多元性別運動密切相關。在土耳其的特定情形和社會結構中，實現性別平等需要根除所有會危及婦女和多元性別個人的行為，包括針對身體、心理、經濟

上的危害，以及性暴力、殺害女性的現象 (femicide)、工資差距，和基於性別的歧視。本文將討論截至 2021 年底土耳其的性別平等／不平等現狀。

## > 土耳其的性別平等／不平等簡史

關於性別平等／不平等(這裡主要是針對生理性別上的平等)的討論，可以追溯到鄂圖曼帝國的現代化時期和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正如 Serpil Sancar 和 Ayça Bulut 所討論的那樣，1920 年代和1930年代的共和改革將女性描繪成現代化的象徵和土耳其社會的現代面孔<sup>2</sup>。因此，性別平等政策是作為現代化或文化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部分所制定，而不是一種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特徵。儘管這一時期將家庭從優視為一種結構，但也通過了一系列關於男女平等的法律，包括選舉權和公民法典。儘管進行了這些改革，但社會當中的性別平等遠遠未能實現，性別不對稱仍然存在。

自 1980 年代末以來，女性組織和女性運動在推動性別平等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卓越的政治努力和在塑造政治和社會格局上的參與度都越來越明顯。在1990年代，由於女性主義的努力，女性首次獲得了法律和社會福利。為實現女性人權，例如接觸公共、經濟和政治資源的平等機會；消除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以及增加女性的政治代表權，女性主義的抗爭將會持續下去。此時期，女性主義者開始質疑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和現存的父權結構。他們還關注性別歧視、男性主導地位、家庭暴力和無償家務勞動等問題。他們著重在分析父權的作用以及父權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由於其努力，大眾對於因性別

>>

不平等所產生的既有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資源機制，都有了更多認識。

### > 當代的挑戰

由於1980年代和1990年代女性主義者的努力，女性運動在社會和政治上變得更加穩健。在2000年代及之後，似乎所有將父權和其社會結構視為問題的女性，不論其宗教、族群、階級、性取向或年齡為何，都成為了女性運動的主角。正如 Hill-Collins (1990) 所說，性別、階級和族群是現代世界上最模糊的政治化社會關係之一。在明白階級、性取向、年齡、宗教、健康狀況、公民身份將區分出不同的女性經驗後，女性主義者持續探究權力關係與女性的社會和政治經驗之間的交互關係。土耳其女性運動的交織性可以說是讓社會運動茁壯的根本原因。

當我們回顧 2000 年代的政策制定過程時，可以明顯看到這段性別政治與1999年赫爾辛基高峰會後加入歐盟的過程是一致的。在這段期間，可以看到土耳其在女性權益進展上的許多跡象。包括：修訂土耳其法典和公民法典，以及主持《伊斯坦堡公約》。土耳其成為第一個簽署《伊斯坦堡公約》的國家，這是第一個確保地區中的女性無論性取向為何，都不會遭受暴力以及防止家暴的歐洲公約。這份文件可以作為一種對多元性別個體的保障。在批准該公約後，土耳其於2012年通過了對應的第 6284 號法條。

然而，隨著2012年後的去歐洲化政策，這些改革逐漸停了下來。這段時期恰逢從平等主義論述轉向保守主義論述的趨勢。這時候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正強調著家庭的重要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這種論述也成為了重新鞏固父權社會結構的重要工具。2021年，土耳其成為了第一個退出《伊斯坦布爾公約》的國家；他們甚至是在沒有得到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批准的情況下直接退出。

儘管過去幾十年土耳其在性別平等上有所進展，但仍存在著許多挑戰。包括女性在政治和勞動力中的代表性不足、女性的高失業率、基於性別的暴力和殺害女性的現象等。此外，疫情也對性別平等產生負面影響。數據顯示，疫情導致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增加。由於限制行動的封城政策，使得許多女性被迫待在不安全的環境下，難以對外求援。

在土耳其這樣的國家，帶有傳統、刻板印象的分工仍然普遍，照護工作仍大多由女性承擔，而男性則負責家計。儘管在性別實踐上可以看見重大的進展，但疫情也同時擴大性別差距，不合理地增加女性身上的重擔。儘管最近的研究顯示<sup>3</sup>，男性在疫情期間花了比以往更多的時間在家務上，但男性在家務勞動上的參與並沒有減輕女性的負擔。事實上，這場疫情揭露了女性勞動的重要性。正如 Melda Yaman<sup>4</sup>指出，雖然疫情使得外出生活全然停擺，但女性仍以有償和無償的身份繼續工作、進行再生產勞動，照顧家中兒童和老年人。以經濟層面來說，她們受新冠肺炎的打擊更大，因為她們身在不安全的勞動市場與工作環境中。這些因素都使女性在公共和私人空間變得弱勢，成為實現性別平等路上的一大阻礙。■

來信寄至：

Aslı Telseren

<[telserena@dogus.edu.tr](mailto:telserena@dogus.edu.tr)>

1. BBC土耳其新聞，〈Toplumsal cinsiyet eşitliği nedir, Türkiye’de neden tartışma yaratıyor?〉<https://www.bbc.com/turkce/haberler-turkiye-49679143> (2022年5月17日，採訪於土耳其)。

2. Sancar, S. and Bulut, A. (2006) 〈Turkey: Country Gender Profile, Final Report〉[https://www.jica.go.jp/english/our\\_work/thematic\\_issues/gender/background/pdf/e06tur.pdf](https://www.jica.go.jp/english/our_work/thematic_issues/gender/background/pdf/e06tur.pdf) (取用日期: 2022年5月9日)。

3. 可以參閱 Ilkcaracan, İ. 以及 Memiş, E. (2021) 〈Transformations in the gender gaps in paid and unpaid work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findings from Turkey.〉女性主義經濟學 27 (1-2), 288-309, <https://doi.org/10.1080/13545701.2020.1849764>, Hızıroğlu-Aygün, A., Köksal, S. 以及 Uysal, G. (2021) 〈Covid-19 pandemisinde toplumsal cinsiyet eşitsizliği: ev işlerini kim yaptı? Çocuklara kim bakt?〉伊斯坦堡政策中心，Sabancı Üniversitesi <https://ipc.sabanciuniv.edu/Content/Images/CKeditorImages/20210401-19040880.pdf> (土耳其文)。

4. Yaman, M. (2021年3月7日) 〈Pandeminin içinden: kadınların yeniden üretim emeği〉Birgün <https://www.birgun.net/haber/pandeminin-icinden-kadinlarin-yeniden-uretim-emeği-336621> (土耳其文)。

# > 土耳其的疫情與中產階級消費

Dicle Koylan, Doğu University, 土耳其



| 來源: Tran Mau Tri Tam, 創用CC。

**疫**情短時間內迅速地改變了我們的社會、機構與日常生活，世界各國政府對於社交生活的限制也使得社交距離與社會隔離的概念成為我們日常的一部分。從做生意到休閒活動，我們生活中需要與人相聚的社交活動都被重新規劃，而這也意味著日常生活模式、消費習慣的改變。

這樣突如其來的轉變在中產白領階級身上尤為明顯，他們在疫情前過著規律通勤上下班、在尖峰時段中塞車、面對面舉辦會議、在辦公室固定時數工作與經常進入公共區域的生活。疫情的爆發無疑轉變了社會的各個環節，與他們的日常生活，而改變最大的莫過於開啟居家工作生活的白領階級。大公司和組織在技術數位化上的努力造就這種工作模式的轉變得以及可能，在疫情期間能在家工作也被認為是一種奢侈。這是中產、上層白領階級所擁有的選擇，而下層階級則無可選擇。

在疫情期間的土耳其，藍領階級與醫護人員被認為是容易受到影響和傷害的群體。許多低技術勞動者只領有低廉的薪資，甚至是只能在惡劣的條件下工作，例如貨運司機、肉類產業工人、超市收銀員和建築工人，他們面臨的感染風險都很高。除此之外，他們的工作條件並不彈性，也不適合技術數位化，更不能在家工作；因此此次的疫情並未全然變化了他們的工作模式。不過另一方面，他們的社交、日常生活、消費習慣，還有許多與人們的互動，像是在咖啡廳的聚會以及參與熱鬧的婚禮等等，當然同樣也受到影響。我們要記得資本社會的核心是倚靠人們持續的工作，所以下層階級的工作必不能有停斷，且盡可能要與過往相同。

## > 對於白領階級的巨大影響

相較於在疫情中習慣奢侈的上層階級與富裕菁英階級，下層與中產階級獨自目睹了這些負

>>

面的衝擊。我強調的是這些中產階級，特別是白領工人他們在疫情間並未失業但承受的痛苦卻未比其他人更少，只是他們所承受的困難並沒有被正視，甚至被忽略了。他們目擊工作技術數位化的困境，在工作條件與公司對於工作資格要求上的改變，也已影響了他們整個生活。

白領工作者通常會在辦公室上班以及參與面對面的會議，在過去的工作環境會面對到很多人際上的互動。然而疫情迅速地轉換這一切，所有生活中那些要面對面的人際互動都被禁止或限制了，當然也包含他們的工作。因此，白領工作者被限制在家並且嘗試習慣在家工作的生活時，他們建立了新的日常模式，也造成消費習慣大規模的轉變。

疫情帶來社交孤立的處境，人們多被限制在家而他們的消費可想而知也被限縮。禁閉、限制和封城降低了人們在公共空間現身的頻率。這意味著奢侈和炫耀性消費（花費金錢購買奢侈品與特殊服務，以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經濟能力）也減少了。人們不購買昂貴的衣服、高跟鞋、奢華的香水或化妝品除非他們要外出。假設他們沒有外出到公共領域，如：購物街或是購物中心的工作室，那麼他們就不會經常與人見面，也不會沈溺在炫耀性消費中。如果沒有公開展示這些物品的機會，就不會有有炫耀性消費。

另一個日常生活和消費習慣的轉變是關於工作場所和家的區分。因為疫情，工作場所變成家中的一個房間，工作和休閒時間的界線消融——無論是工作地點或時間以及家和休閒時間的邊界相較於以往皆更趨近模糊。家空間，已

成為我們接納全天生活的中心。生活和工作日益交融的結果，使中產白領階級的家庭關係惡化。另外，由待在辦公室轉變至在家工作，也意味著人們需要在任何時間都處在準備好能工作的狀態。白領工作者表示，自疫情後，他們的主管甚至在深夜傳電子信件給他們，並期待他們馬上回覆信件。主管階級的期待也轉變了，他們期待所有白領階級的員工隨時都能準備好接受像是會議、製作行銷計畫、撰寫電子郵件、準備報告等任務。這些模糊的工作時間，最終導致私人生活中的問題。這些員工甚至難以計畫與他的家人或朋友共度時光的時間，即使是如同一起看直播這樣簡單的計畫。這導致了人們缺乏動力與憂鬱症比例的不斷上升。

總而言之，新冠疫情直接影響並改變了伊斯坦堡中產白領階級的日常生活和消費習慣。■

來信寄至：

Dicle Koylan

<[dkoylan@dogus.edu.tr](mailto:dkoylan@dogus.edu.tr)>

# > 土耳其的環境主義社會學

Özkan Öztürk, Karabük University, 土耳其



環境主義可以連結環境運動與公民動員，  
反抗專制主義。  
來源：congerdesign/Pixabay，創用CC。

**在**土耳其，環境主義的進程與形式是與該國社會轉變及政治同步發展。隨著環境主義的轉變，除了政治辯論外，也可能發生隨著市民社會發展而來的抗爭、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階級分化所造成的社會分裂。

儘管土耳其社會回應環境議題的歷史，可以追溯回1970年代末，但環境主義組織化直到1980年代末才發生。第一個時期的環境主義組織化，不僅破壞了1980年代軍隊政變對社會組織造成的心理阻礙，也在1970年代藉由奪回抗爭語言，建構了新的政治基礎，將環境問題與政治、經濟相連結。環境主義者的論述超越當時的政治語言，強調正直，並以當時的綠黨作為其政治上的代表。然而這個嘗試倏忽即逝，因為儘管早期環境主義擁有創新的視野，卻受困於狹隘的中產主義實踐，難以觸及大眾。在這樣失敗的政治嘗試後，環境論述持續透過環境無政府組織以不同形式生產。

## > 1990年代：環境主義制度化

到了1990年代，環境主義成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環境的價值與中產階級價值相融合，環境主義也出現在公共領域的視野中。在此時期，環境組織不再只是對環境問題提出政治訴求的社會組織。隨著反對國家權威的公民社會擴張，環境主義成為公民社會的重要元素之一。首先，環境主義非政治的社會形象，使得在政變過程中被去政治化的人們得以重新被納入社會組織中。再者，關於核電廠計畫的潛在風險論述構建，與全國性的工業和火力發電廠所產生的污染，都顯示了環境問題並非區域性的，而是全國性的，這也加速了環境主義論述的流通。舉例來說，貝爾加馬金礦抗爭是最廣為人知的環境抗爭，這個抗爭促使環保主義論述在中產階級間擴散。在這個時期，中產階級成為了環境主義的中堅份子，且延續至今。



土耳其的環境主義抗爭。來源：Özkan Öztürk。

對公民社會的強調，促進了不同環境組織與環境主義的觀點形成。這個「制度化」時期，使環境組織追求不同目標，以及參與不同社會進程成為可能。非政府環境組織關注不同的議題，如農業、保護自然生命、防止侵蝕，並透過教育活動與參與他們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來增加社會對環境的認識與興趣。他們特別關注提高相關知識的活動：近年他們致力於舉辦兒童和年輕人的環境教育活動，以創造一個對環境具有高度認識的社會群體。

同樣在那個時期，不僅無政府環境組織運作制度化，直接針對政治的環境運動也持續茁壯。由於缺乏經濟資源，環境運動缺乏制度化環境主義可利用的宣傳手段；在此情況下環境運動持續強調環境問題的政治層面，如成立聯合工作小組和在地抗爭來表達訴求。環境運動的政治抗爭態度，與制度化環境主義間的共通點，是渴望將環境主義從其政治內容中分離，目的是吸引更多廣大的受眾關注環境問題。

### > 21世紀初：環境主義專業化

1990年代興起的制度化過程為21世紀初期的環境主義提供了新的觀點。相比於1990年代，環境主義組織的議程涵蓋了更詳盡的目標，也確立自身應該利用何種方式達成目標。這個專業化過程的結果，是環境主義組織釐清了他們對於政治與經濟的計畫與意識形態立場的知識結構。然

而，許多在大企業的陰影底下所建立出來的，新的「環境主義者」組織宣傳的是結合當今經濟和政治實踐的、馴化的環境主義。這類的環境主義旨趣，不止存在於大企業控制下的組織。特別在21世紀初期，當正義與發展黨鞏固自身的政治勢力，保守派與宗教勢力嘗試將宗教與環境的論述結合，以擴張自身的政治影響力，這樣的論述意味著與當前局勢和解，而非積極尋求環境問題的解方。

21世紀初，也是環境主義和社會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從中產階級蔓延到較低階級的時期。通訊技術如網際網路在環境主義論述擴散到更廣泛的社會基礎的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更重要的是，由於日漸獨裁的正義與發展黨遠非和解的環境政策，持續增強問題的根源，使得更大的社會群體被捲入環境議題中。有許多相關案例，如建在溪流上的水電站對所在地區和這些地區的數百個村莊造成的破壞，或通過礦產勘探工程對國家公園的掠奪，都使當地人民在直接感受到環境問題的同時也感受到了政治專制。

如今，越來越多人經歷了環境議題，這使得環境主義者的論述在公民社會與政治中都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下，環境主義在反對專制政治的抗爭，與反對環境議題的抗爭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將這樣的角色化約為其政治性質，將忽略環境主義在土耳其短暫發展歷史的路徑——除了政治抗爭外，發展強調民主價值的公民倡議、通過環境教育開展提高意識的活動，也加強了環境主義的社會素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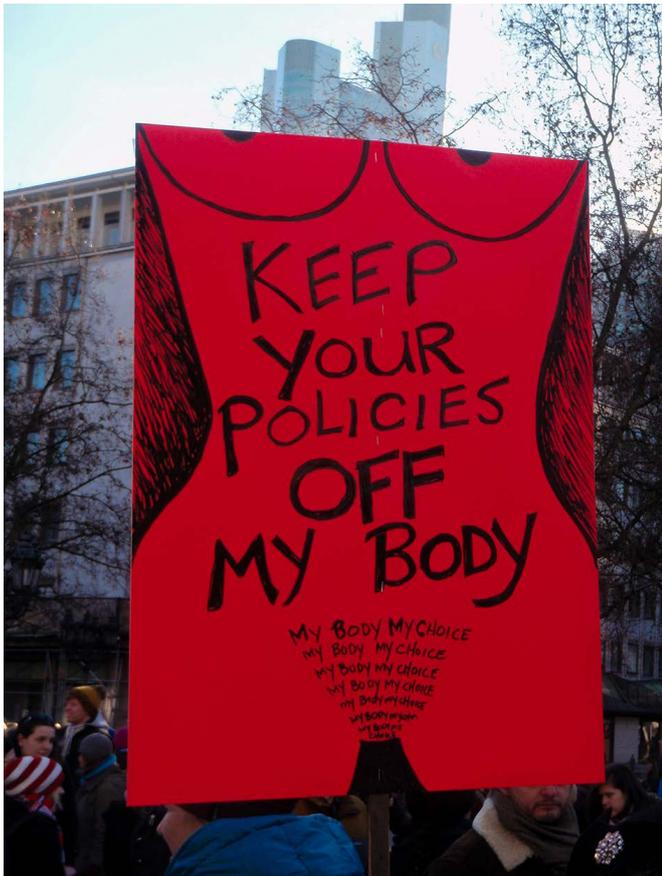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Özkan Öztürk

<[ozkanozturk@karabuk.edu.tr](mailto:ozkanozturk@karabuk.edu.tr)>

# > 捲入土耳其意識形態衝突的女性

Ilknur Hacisoftaoglu, 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 土耳其



2017年，法蘭克福婦女游行中的海報，反對管控婦女身體的政策。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女**性身體的議題跟許多國家經歷過的一樣，一直是土耳其歷史上各種政治辯論的中心。在本文，我將試著去處理女性身體在不同案例中，如何成為各種政治衝突的焦點。

二十世紀初，在土耳其共和國建設初期，政權定義了什麼是共和國的「新女性」。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她們的身體行為（例如：她們對服裝、運動和活動的選擇），被匯整在同一個形式中。女性將透過她們的身體和實踐，履行她們對土耳其民族的義務和責任。

這段時期，新成立的共和國的價值討論焦點之一，就是文明與文化的分裂。新政權的知識分子和創始人認為，西方的文明將透過現代化的樣貌進入這個國家。然而，如何保存代表國家差異和特殊性的文化也因此成了一個大問題。女性在這種對立的定位中，同時代表了與西方相較之下的差異性和相似性。進入公共空間的「老」女性受到嚴格的規定把控，她們將被「新」女性取代。這些「新」女性在法律前與男性平等，但仍維持著傳統的家庭角色。

正如 Çolak 在〈土耳其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公民身份〉中所說，作為一個新公民，每個土耳其女性都必須遵守一系列反映在她們身體上的「理想化」和「文明化」的符號、形象和儀式。體育被認為是展示新女性的場域，像是土耳其第一位女性賽車手 Samiye Cahid Morkaya，以及 Halet Çambel 跟 Suat Fetgeri，這些都是第一批來自穆斯林國家，參加 1936 年柏林奧運會的女性。她們也成了那一段時期的象徵人物。

## > 伊斯蘭主義、世俗主義和圍繞女性身體的抗爭

在 1950 年至 1980 年間，女性社會地位議題的討論度並不高。在 1980 年軍事政變、土耳其政權轉變之後，女性運動才開始興起。如 Nacide Berber 所說：「獨立女性運動的出現，用 Sevgi Çubukçu 的話說，是一場不滿足於合法權利的『反抗』運動。它反對凱末爾主義虛構的性別平等錯覺，並隨著激進和基本教義派的需求下興起。」

1980 年後興起的另一項運動是伊斯蘭運動。這一運動在軍政府展開的場域中持續擴大，並在 1990 年代增加了影響力。1990 年代後，這項運動成為了公認的反對運動，在政治議程上處於靜止的狀態。在頭巾的議題上，女性的身體再一

>>

次成為公共領域衝突的中心。頭巾是伊斯蘭主義者在言說論述上的一大重點，當時的霸權將頭巾視為伊斯蘭教的象徵，將其定位為反世俗主義的形象。因此，婦女不能在學校和政府部門等公共建築中戴頭巾工作。

日益增長的女性運動也影響了伊斯蘭運動。隨著女性是否能夠戴頭巾進入公共空間的熱烈討論，加上受到女性運動的影響，使女性在伊斯蘭運動，甚至是地方政治中都扮演了非常積極的角色。2002年，以伊斯蘭教為導向的政黨AKP上台執政，女性被禁止在公共場合戴頭巾這件事，成為了後續運動的論述核心。他們打造了女性能夠自由佩帶頭巾的論述，並根據女性的權利來形塑自身想傳達的理念，正如女性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身體一樣。在早期的共和時期，論述是立基於文明和文化的分裂；而在當前的衝突中則是基於世俗主義和伊斯蘭教。在這兩種情況下，女性的身體都作為這種衝突的形象被使用。

在隨後幾年伊斯蘭運動興起，女性身體的討論也有了新的層次。頭巾不再是女性身體的唯一爭論。一些伊斯蘭意見領袖呼籲女性在身體上不要逾越底線，要好好遵守伊斯蘭的價值觀。先前女性運動假定得到的權利保障，又再次引起了爭議，其中一項里程碑是2011年的《伊斯坦堡公約》。這項公約旨於保護女性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並預防、起訴和消除針對女性的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力。經過一些看似親政府的報社在幾個月的宣傳活動之後，土耳其在2012年毫不猶豫地簽署了這項公約，但卻在2021年宣布對這項公約有所保留並宣布退出。事實上，這相關的辯論反映出不同土耳其女性權利議題的緊張局勢。雖然恐同是討論中最明顯的議題；但同樣具存在感的，是對女性在傳統地位的改變感到擔憂的政治論述，這些論述正在呼籲那些已經解放的女性重返她們的家庭。

### > 女運動員作為一種符號

就在退出《伊斯坦堡公約》而引發的衝擊還餘波未平之時，東京夏季奧運會已經展開了序

幕。土耳其參加奧運會的男女人數幾乎一樣，儘管他們沒有贏得任何獎牌，但在土耳其被稱為 Filenin Sultanları（「網上蘇丹」）的排球隊仍引起了許多關注。造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位伊斯蘭意見領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推文<sup>1</sup>，使球隊在國際體育舞台上的成功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意義。這條推文呼籲伊斯蘭女孩不要像那些被描述成是流行文化一部分的女排球手一樣，而要成為謙虛和有禮貌的蘇丹子民。這些女性成為了現代土耳其世俗的象徵。因此，女排球隊很快就具有了至關重要的象徵意義，而女性的身體再次被工具性地利用並轉化成伊斯蘭一世俗辯論中的象徵。

在這些討論展開的同時，該隊一名最成功的球員在 Instagram 上發布了一張與女友的合照。這一次，隨著恐同攻擊的增加，那些以反歧視言論為她辯護的人，和那些將她視為道德敗壞跡象的人，又再一次呈現兩極化。然而，就在奧運會之後登場的歐洲女排錦標賽，土耳其隊成為了奪冠熱門之一。由於這些事態，隸屬於政府的土耳其排球聯合會發表了支持該球員的聲明。聯合會表示一個人的私生活屬於私領域，除了運動員的成功和對球隊的貢獻之外，不應去談論其他話題。不久之後，這位運動員就加入了義大利的一支球隊。正如同其他圍繞於女性運動員性向認同的辯論，以及 Pat Griffin 在〈改變遊戲規則：同性戀恐懼、性別歧視和運動中的女同性戀者〉中所解釋的那樣，沉默的共識很快就浮現出來，讓這個問題結束。

目前，正如 Aslı Telsiren 在本文中所指出，雖然女性的身體持續被作為政治辯論的工具所利用，但女性仍不會停下為自己的命運抗爭的奮鬥。■

來信寄至：

ilknur Hacısoftaoğlu

<[ilknur.hacisoftaoglu@bilgi.edu.tr](mailto:ilknur.hacisoftaoglu@bilgi.edu.tr)>

1. (土耳其文) <https://twitter.com/ihsansenocak/status/1419296320267997187>

# > 土耳其的疫情和「數位移民」

Beril Özer Tekin, Doğu University, 土耳其, ESA衛生和醫療社會學研究小組(RN16)



數位移民在疫情期間使用數位設備的經歷。  
來源: Oleg Volovik, 創用CC。

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土耳其也受到疫情的影響，在各個社會階層造成嚴重的經濟和社會性影響。特別是被歸類為弱勢族群的高齡人口(65歲及以上)，相較於其他社會階層，其所受影響的過程有所不同。如Butler(1969)指出，隨著疫情的影響力增加，「年齡歧視(ageism)」也因恐懼氛圍的擴大而浮現。年齡歧視的定義為基於年齡而出現的歧視行為，雖然其與種族主義有相似之處，但最大的區別是我們每個人都會變老！本文將聚焦於高齡人口面對疫情相關限制的經驗，特別是他們對數位化依賴程度的增加。

根據聯合國2019年的數據，全球人口中有7.03億人是高齡人口(65歲及以上)；預估至2050年，高齡人口將增加兩倍，達到15億。土耳其的高齡化速度是歐洲國家的兩倍，卻缺乏相對應的就業和社會服務。考量到人口的「白髮化」，我們有必要針對全球和土耳其的高齡化進行更多研究。

## > 年長者作為「數位移民」

隨著網際網路使用者的數量增加和許多公共服務的線上化，二十一世紀的數位化進程正在加速中，但並非所有個體都能平等地接觸到數位技術。除了經濟和教育變數外，年齡也會造成不利。「數位移民」(Prensky, 2001)點出年長者進入數位領域時會遭遇的困難。它所指的世代是在電腦技術大眾化之前就出生、在晚年才接觸到這些技術的人。這與數位移民的年幼兒孫，與新技術同時出生的「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形成對比。在數位原住民的幫助下，數位移民們使用這些技術的能力開始提升。

TURKSTAT(土耳其統計研究所, 2020)的資料顯示，土耳其65-74歲個體對資訊科技的使用於2015年至2020年間有所增加。高齡用戶的比例從6%提升至27%。最常使用的設備是智慧型手機：根據研究資料(Binark等, 2020)，土耳其57%的女性和60%的男性會使用智慧型手機造訪網際網路。

>>

年長者見證了媒體和通訊的重大轉變，從報紙和廣播開始，接著是智慧型手機、智慧型電視和觸控螢幕。這個以前習慣於寄信和等電話的世代，正在努力適應資訊流通、通訊、通訊速度都提高的新時代。多虧了數位化，年長者才得以在疫情期間的層層限制中享有自由和快樂。另一方面，數位平台也有一些負面影響，例如資訊污染、錯誤資訊、詐騙和語言傳遞錯誤使用錯誤的語言。

### > 疫情期間年長者的數位使用

在疫情期間，年長者更頻繁地參與數位化過程。他們面臨了嚴格的限制，例如限制離開住家周圍的宵禁(2020年3月22日)和禁止使用大眾運輸工具(2020年11月)。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限制給年長者的日常生活帶來了許多問題，尤其是那些無力負擔計程車或私人載具的人。他們的心理和生理脆弱性因疫情而更加被凸顯，儘管需要藥物來治療諸多健康問題如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腎臟問題和心血管疾病等，他們仍無法去做檢查或調整用藥。

不幸的是，年長者要面對的是社會上的標籤、污名和歧視。除了現有的健康或心理問題外，媒體上的歧視性語言使年長者感到被孤立、被社會排除在外。在這個艱困時期，他們從家人和孩子那裡獲得了最大的社會和心理支持；對這一代高齡人口的負面影響有可能會持續數年。除了政府端的限制之外，年長者還需面對孩子對他們日常行為施加的限制，例如購物、拜訪鄰居或與朋友見面，這些壓力和控制增加了他們的恐懼和焦慮。他們不再去看鄰居或朋友，也不再去購物；改為孩子為他們購物，或開始使用線上購物。這導致他們更常為了線上購物以外的目的使用網際網路，例如視訊通話和與朋友社交。臉書、Instagram、推特、YouTube和WhatsApp等在疫情期間成為年長者最偏好的應用程式。

年長者發展出一套應對策略，例如體育活動、步行、上網、看電影和其他疫情期間可行的嗜好(閱讀、縫紉、冥想、參加線上課程)。這些活動有助於他們保護自己的身心健康。雖然多數年長者一開始並沒有步行的習慣，但他們在疫情限制期間採用並維持了步行。

最後，網路和新媒體技術是疫情期間重要的緩和機制。網路和社群網絡發揮了重要作用，幫助年長者應對問題、提供社交和娛樂的機會。我發現年長者使用網路的效率相當高，取決於教育、經濟和社會因素。新技術對於加劇的 aging 過程中減輕日常瑣事和健康獨立的生活十分重要。有鑑於當今疫情期間對年長者、女性和窮人等弱勢族群的不平等加劇，我們更應該為這些群體提供網路服務、獲取智慧型設備的經濟補助，並由相關機構辦理使用教學。■

來信寄至：

Nazlı Beril Özer Tekin

<[btekin@dogus.edu.tr](mailto:btekin@dogus.edu.tr)>

# > 超全球化到永續合作的路徑選擇

Hans-Jürgen Urban, 德國金屬業工會,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德國

**全**球的社會學研究一直都有在關注資本主義「超全球化」(Dani Rodrik)帶來的社會和生態扭曲議題,特別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這套模式在全球的供應鏈中創造了迥異的勞動條件。而主導這些供應鏈的,通常是將總部設在資本主義北方國家的跨國企業,其供應商通常是在全球南方的公司。

## > 全球供應鏈的不對稱

全球研究表明,這些供應鏈上的勞動條件嚴重違反國際勞工組織(ILO)對勞動和人權的基本標準。從代表資本主義的北方世界,其原始設備製造商,到全球南方的中間產品製造商(供應商),勞動條件和健康風險都有越來越差的趨勢。再加上各地危害健康的環境因素有所不同,因此呈現了地理差異。

如果不消除實際勞動條件和理想的法律與道德規範之間的明顯差異,就無法從超全球化過渡到永續合作。工作負荷和健康機會的不對稱分配結構是反覆造成工人抵抗和工會倡議改革的原因。但是改變很難實現,因為工作負擔被不對稱的分配,同時利潤與成本也分配不均。不變的供給-生產關係帶來的經濟優勢全集中在資本主義北方國家的原始設備製造商的擁有者身上,從而使既得利益者繼續獲益。迄今為止,僅有少數案例成功在供應鏈上建立工會的權力結構,或能說服大都市政府引入有效的社會和生態法規。

## > 資本主義全球化來到了臨界點?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和全球疫情映照出了資本主義超全球化的陰暗面,對這整個體系的獲利者來說也是顯而易見的。不協調的「野蠻保

護主義(wild protectionism)」再次出現,撕裂了全球供應鍊和價值創造過程。銷售市場突然關閉,初級產品缺乏導致生產線中斷。儘管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找到新的供應商並開闢替代的市場,但提高的採購成本和額外的市場開發成本仍然造成了壓力。

第二波進展是,在資本主義大都市中,可靠的有酬工作呈現不穩定和碎裂化,進而導致部分勞工陷入更弱勢的處境。他們的工作形式可能是僱傭勞動或自僱工作,在工作、健康和環境負荷等面向上面對不同程度的劣勢。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的德國,這個惡劣的情況在從事肉類行業的東南歐移工勞動條件中變得很明顯。即使是德國立法者所制定的最低限度衛生和感染保護措施規定,在德國工會施壓前,這些都不可見。媒體對非法和不人道條件的報導也造成負責企業和政治人物相當大的壓力。

第三波發展是歐洲的立法干預,要求總部設在歐洲的公司負起盡職調查的義務,這有機會對南方供應商的勞動條件產生正向影響。例如,德國在社會聯盟的壓力下推行供應鏈盡職調查法(德文Lieferkettensorgfaltspflicht-Gesetz)。並在2021年,歐洲議會批准了企業盡職調查與企業責任指令草案。雖然這些規定的成效仍是未知,但它們也可以作為小公司和工會倡議的起點。

疫情再次地凸顯了全球供應鍊的脆弱性,也引發了對於過度全球化的風險及合理性的辯論。例如,德國經濟學家Sebastian Dullien質疑,生產經濟的全球化是不是已經過了最佳時刻,全球化的邊際效益已經無法彌補它帶來的風險。有鑑於金融市場危機和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傷害,特別是在全球南方,工會和其他行動者需要找出

>>

# 「目前為止，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才有可能沿著供應鏈建立工會權力結構，或者說服大都會國家的政府引入有效的社會和生態法規。」

改變既有的全球化路徑的可能性。為日益脆弱的全球化付出代價、對過度剝削移工的警覺，以及加重跨國公司盡職調查的措施，都在創造新的條件，以對全球經濟進行社會和生態上的規範。

## > 全球公共社會學的研究路線

對於全球社會學對話，這意味著什麼？在這個歷史性的時間點，批判性社會科學能如何幫助改善勞動條件？首先，全球生產鏈所在國家的研究人員必須在社會學的自我理解和研究路線上形成共同想法。Michael Burawoy 對全球公共社會學的箴言是一個合適的基礎，這已經產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從勞動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研究工作生態會有幫助。我們需要更多研究，以瞭解在全球生產鏈中實施社會-生態規範及其最低標準有關的利益、策略和阻礙。

經濟、生態和法律相互關聯的問題也會需要政治經濟學、社會經濟和人權取徑的研究相互搭配。永續再生產的勞動、社會和自然等各種面向可以搓揉到共同的研究問題中。勞動階級環保主義研究或環境勞工研究可以作為開始。

組織社會學的研究方向也是必要的。嘗試藉由組織跨國聯合組織來整合國內工會的權力資源，迄今為止結果仍不能令人滿意。沿著全球生產鏈去建立工會權力架構也面臨重大挑戰。特別在南方的工會和公司導向的利益集團中，經常面臨財務和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國家和工會傳統之間的文化分歧也是挑戰之一。研究必須探索，共同承受超全球化後果的經驗是否也可以促進共同制定戰略的過程。

## > 遠景

社會學研究顯示，從超全球化轉變到永續合作體制過程中的阻礙，與其說是因為缺乏知識，不如說是因為利益和權力結構。要消除這些阻礙不能只透過新的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增值邏輯的質疑，也可以開啟一扇機會之窗。如果全球社會學界能帶著這種批判性研究的新意識，那麼新的合作場域和新的全球公共社會學的機會就會出現。■

來信寄至：

Hans-Jürgen Urban

<[Hans-Juergen.Urban@igmetall.de](mailto:Hans-Juergen.Urban@igmetall.de)>

# > 大自然的反撲：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弗克林根鋼鐵廠

弗克林根鋼鐵廠 (<https://voelklinger-huette.org/en/>) 是現存唯一來自工業時代的完整鋼鐵廠，同時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展示了大自然如何回歸這個生產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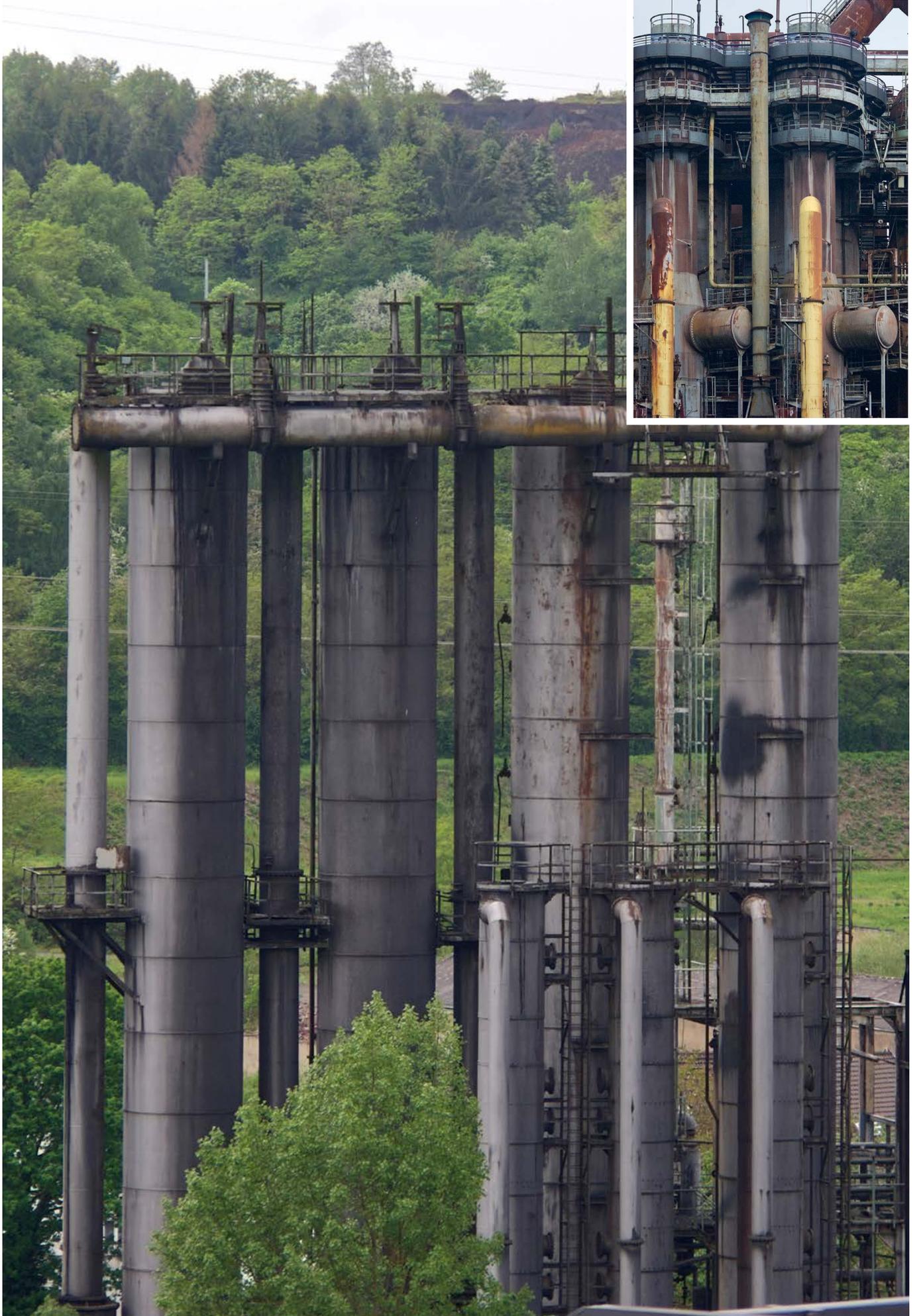
攝影為 Max Aulenbacher。以下由全球對話展示的照片，感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弗克林根鋼鐵廠的公關部門提供。■

來信寄至：

Max Aulenbacher

<[max.aulenbacher@t-online.de](mailto:max.aulenbacher@t-online.de)>







# > 為什麼要向上看？

## Karl Polanyi 談右翼「民粹主義」

Sang Hun Lim, Kyung Hee University, 南韓



來源: Ivan Radic/[flickr](#)。

那些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忽視的人，將近期興起的激進右翼政治解釋為民粹主義的社會保護運動。社會評論家批判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以「第三條道路」的名義接受市場經濟，轉而關注性別、種族等身份政治，卻忽視社會和經濟階級的不平等。他們提議推廣「左翼民粹主義」作為解決方案，藉此將中下層和工人階級從激進右翼的論述，重新定位到更加開放和平等的進步民粹主義。

我的文章（「[向上看勝於向下看](#)」，*Current Sociology*，2021年，優先電子發行）便是想要質疑這樣的觀點：認為心煩意亂的「人民」是右翼政治興起的原因。將激進右翼政治認定為民粹主義，並不能解釋許多中上層「菁英」也支持激進的右翼政黨和政策，以及大多數激進右翼政黨支持新自由主義的工作邏輯。他們不分國籍的譴責接受社會福利的人。波蘭尼（1886-1964）兩次世界大戰的戰間期所寫的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著作，對理解激進右翼政治具有啟發意義。波蘭尼是眾所周知的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批評者。他用「雙重運動」的概念——自我調節的市場和對應的

社會保護之間的衝突——解釋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在他看來，是崩潰）。因此，尊崇波蘭尼的學者經常將激進右翼政治解釋為大眾反對資本主義破壞的一種社會保護運動。然而，波蘭尼本人將法西斯主義視為資本主義菁英為了保護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而進行的極端運動。

### > 波蘭尼的雙重運動和法西斯主義

波蘭尼認為，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和資本家試圖使經濟不受到「大眾」的干預。自我調節的市場將勞力、土地和貨幣商品化，侵蝕了人類和社會生活的基礎。那些因為這種「虛構的商品化」而被剝奪生計和社會關係的人可能很想保護自己免受自我調節市場的侵蝕。對於那些希望保護自我調節市場的人來說，大眾對經濟的保護性影響會扭曲市場的「自然」功能，從而導致生產力低下，最終導致馬爾薩斯式的末日。

從歷史上看，資本家在保護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之間曾找到妥協路線。然而，經濟急劇下滑導致來自民主的壓力增加，最終導致雙方陷入僵

局。這就是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情況。法西斯主義似乎是一條拯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簡單的出路」，藉由破壞民主制度並將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轉變為社群主義體制，約束人們為「共善（common good）」做出有生產力的貢獻。波蘭尼提醒我們，沒有一個戰間期的法西斯領導人是在沒有政治和經濟菁英的支持下獲得政治權力的，即便是希特勒也是如此。

當然，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與當前的政治形勢並不完全相同。常被指出的差異是，當前的激進右翼政治人物經常開放地接受民主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激進右翼政治往往會導致其民主退化成「非自由民主」，甚至「選舉獨裁」。此外，從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後的政治動盪也可看出，即使是選舉這樣基本的民主制度，也可能在看似穩定的民主社會下備受挑戰。

### > Polanyi 的法西斯主義和當前的右翼政治

正如我文章標題所暗示的，波蘭尼告訴我們，在分析激進右翼政治的崛起時要「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為了防止激進右翼政治的勝利，我們需要努力區分上層和中產階級，至少要像團結下層和中下層一樣努力。這樣，我們才可以避免資本主義菁英集中可調動的資源和資訊，打擊進步政府推行的社會保護政策。這些政策在戰間期加劇了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僵局，並為鞏固了以法西斯作為解方的基礎。

我們如何劃分上層和中產階級菁英？某種意義上來說，身份政治的重組淡化了社會階級和政黨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性。這種重組將上層和中產階級分開，將其中許多人吸引到進步的那邊。當然，正如 Nancy Fraser 以「進步的新自由主義者」所進行的批評，忽視階級衝突和經濟不平等是有危險的。然而，不容忽視的是，身份政治的議題也讓許多中上層階級者與進步黨派結盟。

另一種劃分菁英的可行方式是普遍性的社會政策。Thomas Piketty 著名的研究呈現了財產上的不平等遠遠地超過收入上的不平等。許多年輕專業人士，他們收入豐厚但資產貧乏，希望能在面對未來收入漸少及因為技術和產業轉型而導致的專業價值下降時，可以有一份保障。進步政黨可以推動普遍性的福利政策，不僅有利於下層階級，也有利於中上層的專業人士。特別是，結合連動收入的社會保險計畫與費率齊一的平等再分配體制，可望吸引那些高收入低資產的專業人士。

### > 結論

將右翼政治解釋為「民粹主義」社會保護運動，讓我們「向下看」，將右翼政治的責任推卸給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波蘭尼對法西斯主義的分析促使我們「向上看」資本主義菁英。如果沒有他們提供資源和資訊，激進右翼政治人物很難獲得政治權力。波蘭尼提醒我們，儘管他們發表了各種民粹主義言論，激進右翼政治人物們始終是支持市場經濟。如果我們接受波蘭尼將法西斯主義的政治賦權解釋為菁英們嘗試保護自我調節的市場，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分裂資本主義菁英，並且促進下層階級之間的團結。■

來信寄至：

Lim Sang Hun

<[limsanghun@khu.ac.kr](mailto:limsanghun@khu.ac.kr)>

# > 從殺人犯的故事中學習

Martín Hernán Di Marco, Oslo University, 挪威; ISA 傳記與社會研究委員會 (RC38) 成員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聖馬丁監獄(小圖)和德沃托聯邦監獄(大圖)。  
來源: Martín Hernán Di Marco。

**從** 社會科學、心理學到法律、文學和電影，許多領域都會討論兇殺議題。正如 Oriana Binik 所說，一系列的學術和民間理論都在說明人們對暴力的迷戀，這些理論針對我們如何看待這個議題提出叩問。然而，妖魔化、神話化、病理化，或是預設肇事者的行為是非理性的，減損了我們去理解其背後的社會過程的可能性。

這個主題的一個主要矛盾是，很少人會研究殺人犯的故事和傳記，把犯人自己的說法和邏輯納入考量。學術研究從微觀、中層和宏觀各層面開展人們對暴力致死的認識。然而，這種研究方式合理地開拓了從統計分析和關鍵變因(如年齡、性別和社會經濟地位)的探討，但它不利於做敘事過程的全面分析。

## > 殺人犯的世界觀：呼籲一種基於經驗的理解

暴力人類學的先驅 David Riches 指出該領域的一個關鍵特徵，「暴力」往往是目擊者和受害者所使用的術語，但暴力行為者的主觀解釋卻是缺乏的。因為過於關注量化數據，犯罪者經歷及合理化暴力的具體方式鮮為人知。

我們可以從罪犯的角度學到什麼？他們的故事和生命能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男男兇殺案？利用敘事犯罪學分析，我的博士論文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瞭解罪犯所使用的敘事，並分析這些事件在他們的故事中的重要性。這種方法在設計上避免了本質主義分析，並試圖強調暴力行為的意義在每個社會群體中都是歷史的、文化的建構。

>>

## > 敘事與傳記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是72份對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男性犯罪者的敘述性訪談。為了符合抽樣標準，受訪者皆是因爭吵和人際糾紛而被控蓄意殺人的人。訪談是配合受訪者選擇討論的敘事和時間。分類過程——拋開個人經歷和信念——在分析中至關重要。田野觀察則是在聯邦和省級監獄以及服滿刑期的男子家中進行。

每個受訪者都會收到他受訪過程的逐字稿，並與受訪者合作撰寫一篇簡短的生命故事重現。遵循開放和軸向編碼的過程。本文重點關注兩個主題：傳記轉折點（被認定為人生十字路口的時刻）和理由（受訪者對事件的解釋）。

## > 暴力致死：意義和故事

探索罪犯如何賦予兇殺意義是一項有趣且豐盛的投入。關於男性犯人如何表現跟說明暴力致死，有三個主要的發現。

首先，他們會以多樣化和變動的方式談論和表現身體暴力。暴力被描述為自發的、自然的、在特定情緒狀態下的邏輯判斷或一種動態情境；暴力被視為一種必要的手段、一種懲罰形式，以及一種恢復榮譽、男子氣概和地位的做法；暴力也可能是一種非蓄意的行為，或者是當時社會處境下的不幸事件。暴力作為一種實踐和一種資源，是個有多重價值的行動。為了中性化和合理化它，男人選擇以缺乏能動性、轉移自責感，並讓自己符合與某些主流的敘述（「我別無選擇」、「是對方自找的」、「我失控了」、「這是我的成長經歷使然，而不是我」）。因此，暴力從不缺乏意義，它終究是行動者使用的合理資源。

其次，與我最初的假設及心理健康領域的霸權理論相反，這些理論以暴力行為的「創傷」性質將其病理化，兇殺事件沒有被視為一個轉折點。他們被父母遺棄、在金融危機下失業、戲劇性的分手、獲得或失去朋友，最值得注意的是，入獄是他們生命故事中的重大轉變。這些事件改變了他

們的「自我」以及他們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然而，兇殺案本身很少被呈現為人生十字路口的時刻。

監禁，而不是殺戮，被描述為重大事件與這個機構對他們的意義有關。它被表示為他們生命中「谷底」的時刻，一個改變和重塑他們生命歷程的機會，一個從過去的自己中得到的救贖，甚至是一個被社會決定的事件。

第三，監禁、兇殺和先前嚴酷的生命事件被呈現為「學習經歷」。受訪者普遍使用偏向正向地評價有害經歷的敘事。監禁、打架、與親友失去聯繫被解讀為成熟、個人成長、主體轉變或強化的時刻。一次暴力死亡事件可以開啟一個新的「自我」。這種理由與霸權陽剛氣質文化密切相關，也與監獄中不斷重複的形塑故事的論述（即心理學、生命教練、宗教、康復和社會工作）密切相關。

## > 結語

正如社會互動論者幾十年來所強調的，維護社會行動者的觀點是必要的，這有助於理解社會事實並避免在既有的科學範疇內解釋它。雖然關於兇殺的學術理論有非常多——提到死亡對罪犯的人生而言幾乎普遍是「創傷」影響——但只有關於意義建構的經驗探索才能有助於全面理解這個現象。在學術和常識中，殺戮與特定時刻和非理性、瘋狂或不道德的行為有關。這項研究表明並非如此。

重新檢視現有的資料、理論、框架和體制，他們賦予暴力特定的意義，卻沒有足夠的經驗證據去支撐一種有價值的探索方式，與此相關的研究仍待更多的探討。■

來信寄至：

Martín Hernán Di Marco

<[mh.dimarco@gmail.com](mailto:mh.dimarco@gmail.com)>

# > 巴西數位平台的貨運工作

Bruna da Penha 和 Ana Beatriz Bueno ·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UERJ), 巴西



疫情之初，巴西的送貨勞動者。  
來源：Marcelo Renda/[Pexels](#)。

**根** 據經驗數據與社會學式的思考方式，我們對於在疫情期間的巴西貨運勞動者的工作條件所受到的衝擊進行調查；同時也分析這樣的衝擊是否影響勞動者們對於不平等的主觀認知。在研究中我們假設：健康危機並未造成不平等現象的誕生，而只是加劇了這樣的狀況。也就是說，疫情期間貨運勞動者的健康危機，使他們更可能面臨在工作條件上（如：工作時數、薪水和風險）的惡劣情況，也加深了勞動和資本的衝突。我們使用巴西數位平台上一百名貨運勞動者的樣本作為原始資料庫，透過參與者在谷歌表單上所提供的答案

取得這些資料。而研究的參與者位於巴西東南部、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最後，表單回收的時間落在2021年的3月至5月間，其中包含量化與質性的資料。

## > 優步化與勞資衝突

我們絕不能將勞動的優步化(uberization)作為史無前例的狀況，而是應該將其置於社會物質中去理解。也就是說，它並非自古以來資本積累模式的不一致或偏差。勞動力商品化的社會關係，是優步化工作的特徵之一；要解釋此概念，必須由過去生活意義遭受「公有化」的現象出發。這是資本主義中勞工從屬性的社會狀態，因此它與法律地位的討論是無關的。

>>

雖然不能將優步化解讀為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但我們必須去理解此現象在當代是如何被呈現的。以巴西貨運勞動者而言，勞動者和平台對於不平等現象看法上的差異，多源自於雙方日常生活和在城市中工作經驗的鴻溝。即使工作過程的碎化變得日益嚴重，但勞動者們穿梭於城市和與他人接觸的方式，使他們對於這段工作經驗有著與平台絕然不同的感受與看法。

此外，貨運活動的關係性，也揭示了人類工作的本質：其作為一個過程，成為了現實的中介、使互為主體的關係得以發展。這樣的觀點，對於理解不平等現象，以及抗議活動的集體表現，皆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會接著說明由此經驗研究所獲得的研究結果。

### > 谷歌表單上的問卷調查

關於疫情期間貨運勞動者的每日工作時數：有42%的人表示他們每天至少工作9到12小時，20%的人每日工作有8小時，13%的人則每日至少工作13小時甚至更多。另外，我們也詢問疫情前的工作時數？以疫情前已任職於此行業的（共66名）受訪者為樣本，有39.3%的人每日工時為9至12小時、22.7%的人每日工作8小時、9%的人每天工作13小時以上。從數據來看，疫情間貨運勞動者的工作時數確實上升了。

至於他們在疫情間的月收入，有25%的人表示薪水仍平均低於巴西的最低薪資（在當時約為1,100雷亞爾）；23%的人表示其落在1,100至1,650雷亞爾間。另外，有15.3%的人說明，他們在疫情之前的報酬就低於目前的最低薪資。約有37%的受訪者強調在疫情前賺得約2,750至3,300雷亞爾的薪資，但如今只剩15%的人得到同樣多的報酬。資料顯示，即便貨運服務的需求與勞動者們的工時皆大幅增加，但他們的月收入卻大幅度下降。

因此，清晰的數據顯示了每日工作13小時以上，以及月收入低於最低工資的受訪者的比例明顯增加。「薪水多寡」看似就是勞動者們對於在平台工作上產生不平等感受的最主要因素；更何況，有多達84%的受訪者表示這個工作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也就是說，對巴西的貨運勞動者們而言，這工作並非只是打零工賺外快的作用，而是份不可或缺的薪水。

由勞動者們對於平台要求改善的方面來看，有91%的受訪者皆要求薪資的調漲，其餘的要求還包括：改善不當封鎖的問題，對於意外險、膳食津貼、自治權、勞工權益與勞動契約的保障。在社會的危機加劇之際，勞資關係的不平等同樣惡化且更為顯著。以不平等關係的貨幣層面切入觀察，我們發現它最能具體地顯現勞動的社會矛盾。

至於人們從事貨運工作的原因，大部份的受訪者皆有著相似的回覆：他們需要一份收入來糊口飯吃。以社會人口學的概況來看，98%的受訪者為男性，54%為有色人種（年輕人佔多數）。另外，有24%的受訪者年齡介在31至35之間；19%的人為21至25歲；再來是35至40歲的人，佔受訪者的18%；最後，25至30歲的人佔了17%。上面的數據反應了一項事實——年輕人是受失業影響最大的族群。在他們的教育程度方面，有77%的受訪者擁有高中或大學學歷。最後，33位受訪者表示他們曾遭受過職業傷害，但平台只願意提供相當少的援助。以上這些數據揭露了在疫情期間，勞資衝突的矛盾與不平等愈加嚴重的情況，增強了貨運勞動者們在工作中的不穩定性。■

來信寄至：

Bruna da Penha

<[brunapmcoelho@gmail.com](mailto:brunapmcoelho@gmail.com)>

Ana Beatriz Bueno

<[anabeatrizbuenoadv@gmail.com](mailto:anabeatrizbuenoadv@gmail.com)>